

# 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 ——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

嚴志雄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關鍵詞：屈大均 明清之際 詠梅詩 歷史記憶 明遺民主體性 遺民情境

尤憶崇禎初元，偕邵子僧彌，觀梅西山。于時明離初旦，霧霧乍滌。山中草木，欣欣向榮。游人擔夫，皆有彈冠振衣之色。今何時哉！冰堅地凍，萬木皆僵。前村一枝，束爲薪楚。獨西山老梅，居然無恙。殆真有無量主林神，擢榦舒光，而爲護持者耶？

錢謙益〈題觀梅紀遊詩〉(1663)<sup>1</sup>

## 一、前 言

屈大均（翁山，1630-1696）是從血泊中走過來的。順治四年（1647），大

本文部分內容曾於二〇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於美國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年會以“*In Search of an Historical Agent-Qu Dajun's 1659 Poems on Plum Trees*”為題宣讀，承蒙 Professors Wai-yee Li, Allan Barr 講評，又蒙林順夫、Grace Fong 教授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另又於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尋找歷史的『動因』——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為題，於中國文哲研究所作專題報告，衷心感謝與會諸同仁、學者不吝賜教。論文撰寫期間，尤其感謝王靖獻、廖肇亨、楊晉龍、衣若芬、楊芳燕博士，郭天健、姚道生兄或反復問難，或提供意見，或惠示材料。本文並參考兩位匿名審查人意見書及《集刊》編輯委員決審意見，盡量改更舛錯，裨補疏遺，謹此致謝。

<sup>1</sup>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580。

均十八歲。是年春，大均業師陳邦彥（1608-1647）起兵粵東高明山中，約陳子壯（1596-1647）起南海、張家玉（1616-1647）起東莞。嶺南遂爆發了一連串悲壯的、激烈的反清戰爭。至十月而三人後先殞命，史稱嶺表三忠。其時大均從陳邦彥軍，獨當一隊。他在〈書西臺石〉一文中回憶說：「予之事文忠〔子壯〕、文烈〔家玉〕、巖野〔邦彥〕三公，或執鞭弭於沙場，或奉血衣於空谷，其艱難險阻之狀，哀痛思慕之懷，歷久不衰，……」<sup>2</sup>順治六年（1649）春，大均奉父命赴肇慶永曆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得薦，行將官中秘，聞父疾，遄歸。次年冬，禮函呈（1608-1685）於番禺雷峰海雲寺爲曹洞僧，法名今種，字一靈，而以所居曰死庵。大均早歲即以詩文馳名，後與陳恭尹（1631-1700）、梁佩蘭（1629-1705）稱嶺南三大家<sup>3</sup>。

順治十四年（1657），大均二十八歲。秋，以僧服度嶺北遊。清帝國已建立十多年了，我們關注的明清之際人物卻仍倉倉皇皇，未遑寧息——本年錢謙益（1582-1664）七十六歲，居鄉。吳偉業（1609-1672）四十九歲，居鄉。前一年吳偉業陞國子監祭酒，歲末獲假離京，即堅志不復出。龔鼎孳（1616-1696）四十一歲，前年以言事降官八級，本年頒詔至粵。黃宗羲（1610-1695）四十八歲，以避清名捕，連年行止不定。顧炎武（1613-1682）四十五歲，元旦六謁明孝陵，春返崑山辭別親友，遂開始整整二十五年的山東之遊。王夫之（1619-1692）三十九歲，四年來流亡湘南，本年歸隱衡陽續夢庵。朱彝尊（1629-1709）二十八歲，本年入粵與諸文士遊。及歸，持大均詩遍傳吳越。王士禛（1634-1711）二十四歲，本年八月，集諸名士於濟南大明湖畔，舉秋柳社，賦〈秋柳〉四章，傳誦四方。

大均出粵的目的至今仍爲懸案。表面上他是出塞訪尋爲清室流放瀋陽的師叔函可（1612-1660）禪師<sup>4</sup>，但出嶺前他曾說：「白草連天過鹿磧，黃雲蔽日向

<sup>2</sup> [清] 屈大均：〈書西臺石〉，《翁山文外》，卷10，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下簡稱《全集》），第3冊，頁182-183。西臺爲著名宋遺民謝痛哭文天祥處，後成遺民作品中重要典故。大均生平極心儀謝翹。本文所述大均行蹤多據汪宗衍：《屈大均年譜》（下簡稱《汪譜》），收入《全集》，第8冊，〈附錄〉1，頁1841-2013。

<sup>3</sup> 「嶺南三大家」之稱肇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王隼選輯《嶺南三大家詩選》。時大均六十三歲。參《汪譜》，頁1985-1986。

<sup>4</sup> 關於函可流放遼東始末及其在瀋陽一帶的宗教活動，可參拙著：Lawrence C. H. Yim, “Political Exile and the Chan Buddhism Master —— A Cantonese Monk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未刊稿）。

龍庭。不是摩騰取貝葉<sup>5</sup>，將同介子持長纓。」<sup>6</sup>傅介子以刺殺外國王留名於史<sup>7</sup>，論者謂審大均此篇詞意，其北行似有「革命」之舉，訪函可云云，掩人耳目而已<sup>8</sup>。（順治十八年，大均南返前於紹興辭別祁駿佳，說：「昔我別慈親，王事勞孤征。風雪歷四載，謀深竟難成。」）由是觀之，「革命」之說是不無道理的。順治十五年（1658）春，大均由南京至北京，憑弔明崇禎帝死社稷的海棠樹。在京識王士禛（時王氏在京應殿試，五月即以二甲進士及第）。王士禛極賞大均之詩，為選百篇，謂唐、宋以來詩僧無及者<sup>10</sup>。五月，大均在薊門。旋東出榆關，周覽遼東西名勝，惟訪函可不得達，弔袁崇煥廢壘而還。冬，客廣陵。順治十六年（1659）初春，大均持覺浪道盛（1592-1659）書，拜謁錢謙益於吳門芙蓉莊<sup>11</sup>。錢謙益為書告門人毛晉（1598-1659），說：「羅浮一巒上座，眞方

<sup>5</sup> 摩騰指迦葉摩騰，東漢明帝時攜經卷與佛像至洛陽，住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

<sup>6</sup> 本文引用大均詩詞據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下簡稱《屈大均詩詞》），頁27-28。

<sup>7</sup> 傅介子事參《史記》卷二十〈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060-1061。

<sup>8</sup> 汪宗衍說，見《汪譜》，頁1870。

<sup>9</sup> 屈大均：〈梅市別祁四丈季超〉，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52。

<sup>10</sup> [清]王士禛著，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11，頁250-251「粵詩」條，論大均詩並及此事。大均〈屢得友朋書札感賦〉十首其三說：「最早知音是阮亭，青蓮不得擅仙靈。九天咳唾紛珠玉，亂作飛泉下杳冥。」詩後大均自注：「王阮亭云：『翁山先生詩殆如太白所云「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014。

<sup>11</sup> 大均有〈訪錢牧齋宗伯芙蓉莊作〉一詩以紀其事：「四面烟波繞，藏書有一樓。興亡元老在，文獻美人留。橋細穿荷葉，舟輕及素鷗。愛予初命筆，交廣有春秋。」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02。末句當指大均所撰《皇明四朝成仁錄》中廣州殉明人物傳記部分。參汪宗衍：《汪譜》，頁1880。大均先師函呈，復師覺浪道盛。他在〈復石濂書〉中說：「夫僕之為僧也，蓋以弱冠時，國破家亡，無所依歸，故逃於壞衣禦髮耳。親雷峰〔函〕之教，受天界〔覺浪道盛〕之法，……」見屈大均：《翁山佚文》，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487。大均此舉，當世後世頗有疵之者。如潘耒（1646-1708）《救狂砭語》中載大均此書，後下案語說：「所可歎者，翁山耳。既以天然為師，轉而為師覺浪，欲與天然雁行。天然諸法嗣不與，乃推獎石濂，認為同門，以壓阿字澹歸，皆出私意。甚至代石濂作書，以觸犯本師，何倒行逆施至是！」見〔清〕潘耒：《救狂砭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04-205。又參汪宗衍：《汪譜》，頁1876。

袍平叔，其詩深為〔杜〕于皇〔濬：1610-1686〕所嘆，果非時流可及。」<sup>12</sup> 遂為大均作〈羅浮種上人詩集序〉。

錢謙益讀到的是大均哪些詩呢？今存大均出嶺後所作之詩均非尋常之什，慷慨激昂，每多「愴悅之言」（朱彝尊語）<sup>13</sup>。錢謙益在序中說：「以是詩句舉揚妙喜忠君愛國一點熱血，使百千萬劫忠臣義士種性不斷，則種師之筆管與屠兒之屠刀，說法熾然，有何差別？」<sup>14</sup> 南宋妙喜大師（大慧宗，1089-1163）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sup>15</sup> 廣額屠兒放下屠刀，大徹大悟，立地成佛。錢謙益以妙喜、屠兒比擬大均，是措意於大均作品鼓舞人心、激揚意志的力量。大均之見賞於錢氏，詩藝而外，可能還是大均詩「忠君愛國」的精神<sup>16</sup>。今檢大均此二年詩作，這「一點熱血」觸目皆是。其過大梁，說：「歸來宴吹臺，酣舞雙吳。驚沙翳白日，垂涕向神州。徒懷匹夫諒，未報百王讎。紅顏漸欲變，歲月空悠悠。」<sup>17</sup> 在真定道中，說：「飲馬濁漳流，茫茫去國愁。沙陰迷雉堞，草色暗狼溝。博浪千金盡，淮陰一飯留。誰憐飄泊苦，忍死為神州。」<sup>18</sup> 得觀崇禎帝御琴，發為長歌，如此收結：「請君罷彈莫終曲，恐令南北諸侯哭。偶然失勢龍為魚，終見時來馬生角。他朝日月定重輪，今夕鸞皇聊獨宿。否極泰來天有舊，萬里高飛翼先伏。偕君阿閣賀昇平，雌雄和鳴三十六。」<sup>19</sup> 出永平，說：「洪河無停流，驚枝無栖翰。志士生亂離，七尺敢懷安。青萍不刈黍，明月寧沉淵。斷袂別親友，成敗俱不還。誅秦報天下，一死如泰

<sup>12</sup> 錢謙益：〈與毛子晉〉，《錢牧齋尺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中，頁18a-b。錢書于皇原作「于王」，當係誤植。

<sup>13</sup> [清]朱彝尊：〈九歌草堂詩集序〉，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8冊，〈附錄〉3，頁2119-2120。

<sup>14</sup> 錢謙益：〈羅浮種上人詩集序〉，同前註，頁2118-2119。

<sup>15</sup> [宋]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24，收入《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第1冊，頁752。大慧雖方外士，仍積極抗金，並倡「菩提心即忠義心」之說，影響明末清初佛教性格至鉅。錢謙益於其著述中屢述大慧宗果語。

<sup>16</sup> 關於明遺民之逃禪及遺民僧人作品中的忠義思想，可參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臺北：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94年）第四節：「救國精神：從『菩提心即忠義心』看逃禪遺民的忠義節操」，頁50-62；又氏著，《明末清初の文藝思潮と佛教》（東京：東京大學博士論文，2001年），頁147-165；趙園：《明清之際士人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89-308。

<sup>17</sup> 屈大均：〈過大梁作〉，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55。

<sup>18</sup> 屈大均：〈真定道中〉二首其二，同前註，頁60。

<sup>19</sup> 屈大均：〈烈皇帝御琴歌〉，同前註，頁69-70。

山。」<sup>20</sup>在遼西，說：「邊秋多風沙，狐兔長悲鳴。慷慨思畜牧，因游雁門營。饑食太行薇，渴飲桑乾冰。問我亦何爲，壯士不顧生。」<sup>21</sup>返南京途中，俯仰今昔，說：「傷心一代冬青樹，葉葉枝枝是大忠。」<sup>22</sup>這是論大均其人其詩者每喜彰顯的一面。

本文所欲探論的，卻是大均另一種聲音（poetic voice），含蓄而深婉，出之以極冷靜的詩篇。大均以詩文知名當世後世，不徒有激懼清厲的一面。順治十六年春，大均抵南京後，掛錫靈谷寺，地靠明太祖陵墓孝陵。朱明興於南京，亡於南京<sup>23</sup>。前朝遺物，觸目驚心，大均感慨係之。大均本年寫下不少意義極不尋常的詠梅詩。大均詠梅，每寓故國之思、身世之感。自冬徂春，大均詠梅不下二十首（含詞一闋）。本年六、七月間，鄭成功南明水師將薄南京，東南大震。風雨欲來，大均是不可能沒有聽聞的<sup>24</sup>。但大均願意我們相信，這些詩成於他幽處山中，躡躅梅畔之際，是出於他對歷史、家國、身分的沉思。梅在大均筆底是明室的縮影和明遺民的化身。

本文探究大均本年所作詠梅詩，分析詩篇的結構、象徵、託寓，討論其引發的有關詩體的理論問題，並藉以闡示明、清易代之際的遺民情境。我們認為，大均寫作這些詠梅詩有一重要意圖。大均是透過詩篇思考遺民在明、清改朝換代的歷史境況裏所可、所應扮演的角色。在下面的討論，我們會注意到，大均在在透露著一個信念：遺民雖為政治和社會邊緣化了（marginalized）的「微物」，仍應自許為改變歷史塗轍的媒介。大均下面的詩展現三個互為表裏的母題

<sup>20</sup> 屈大均：〈出永平作〉，同前註，頁80。

<sup>21</sup> 屈大均：〈出塞作〉，同前註，頁81-82。關於大均在遼地所作的一組詠史詩，可參拙作：〈屈翁山「詠史」詩試解〉，《大陸雜誌》84卷1期（1992年1月），頁5-13。

<sup>22</sup> 屈大均：〈泰州作〉二首其二，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92。冬青樹為遺民作品中重要典故。元初西藏僧人楊璉真伽挖宋帝陵墓時，宋遺民林景熙、謝翱等收拾遺骨，葬於蘭亭，於其上植冬青樹以為標誌，林作〈冬青花〉，謝作〈冬青引〉詩以抒忠憤。事詳〔清〕黃宗羲：〈冬青樹引註〉，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冊，頁251-254。

<sup>23</sup> 明太祖定都南京，成祖遷北京。一六四四年北京陷，福王弘光朝復立於南京。一六四五年弘光覆亡，明諸王流竄南方，明室實際上已滅亡。

<sup>24</sup> 鄭成功一六五九年圍攻南京乃是一連串「北伐」行動的最後結果。一六五八年，鄭師已擬直搗南京，惟於赴崇明途中遇颶風，被逼折返。鄭成功揚言，來年必再入長江，收復南京。參 Lynn Struve (司徒琳),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82-189；中譯本見李榮慶等譯：《南明史 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71-178。

(motifs)：忠義、隱逸與復生。大均所關注的，是明、清之際的歷史記憶 (historical memory) 及明遺民主體性 (subjectivity) 詩性的呈現，而這兩者是通過體物、詠物（梅）的手段而成就的。因而我們將探析詠物詩體在大均操作下的形態。為了凸顯明遺民所面對、所喚起的情境，我們嘗試重構宋遺民和明遺民精神與心理意蘊的某些重要元素。

## 二、陵、寺、梅——歷史象喻網絡的生成與歷史的物化再現

得從靈谷寺說起。大均抵南京後住靈谷寺，這無異親近明朝一段意味深長的歷史記憶。就某一意義而言，靈谷寺是明初建國論述 (nation-building discourse) 的一部分（詳下）。明初定都南京，明太祖、成祖等均崇信佛教，並冀佛力「密贊化基，陰翊王度」；立國之初，即敕建或重修南京寺院。洪武中期以後，明太祖通過修建、徙建、新建、賜額等方法，建立以靈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雞鳴寺為代表的國家五大寺。此舉對南京乃至全國佛教和寺院的恢復和發展，影響深重<sup>25</sup>。

五大寺之中，明太祖與靈谷寺個人因緣最深。靈谷寺是明太祖敕建的，然而它的前身歷史悠久。靈谷寺原在鍾山西南坡獨龍崗（亦稱獨龍阜）麓，離朝陽門十里。南朝梁天監十三年（514），武帝為寶誌大師建塔於鍾山玩珠峰前，名開善精舍，後改為寺。唐先後更名為寶公院、開善道場。宋初名太平興國寺，後稱十方禪院。明初名蔣山寺，而明太祖營建孝陵於其地。洪武十四年（1381）敕遷蔣山寺於東南坡，更寺名為靈谷，御書匾額「第一禪林寺」，御撰〈大靈谷寺記〉，命杭州府儒學教授徐一夔撰碑文以紀其事。明太祖且命贍僧千人，賜田獨倍他寺（共二百五十多頃），以飯衆僧<sup>26</sup>。於是終明之世，靈谷寺為天下第一叢林。據記載，靈谷寺左為梅花塢，春來香雪萬株；入寺則萬松杳靄，可五里許<sup>27</sup>。晚明焦竑（1541-1620）曾作〈靈谷寺梅花塢〉六首，有這樣的描寫：「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其一）「初春老樹花發，深澗無人水香。」（其

<sup>25</sup> 參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99-102。

<sup>26</sup> 見〔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卷3，頁1a，總頁75；卷2〈欽錄集〉，2b，總頁51。

<sup>27</sup> 同前註，卷3，頁1a，總頁75。

二) <sup>28</sup> 焦竑另有〈遊靈谷寺〉詩，言及靈谷寺的松樹：「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遙。」<sup>29</sup> 可知靈谷寺一帶晚明時仍多梅松。明、清之交，大均時人余賓碩曾遊此地，有詩並注。注文中透露，靈谷寺已不復往昔風采了：

過郊壇，折而北，歷梅花塢，遂遊靈谷寺。梁天監中，於鍾山玩珠峰，就寶公塔建寺，曰開善，宋名太平興國，明初移置此，更賜額「靈谷」。入「第一禪林」門，舊時有松徑五里，交柯雲蔚，靈天晦景，麋鹿數百為群，今無矣。……出寺謁孝陵，遂上鍾山。<sup>30</sup>

大均不能無詩，他作〈靈谷寺〉(1659)，說：

往日出門去，蕭森十里松。梅花因太祖，香水自神龍。

烟雨宮城暗，莓苔輦路封。興亡無限恨，消得一聲鐘。<sup>31</sup>

梅花塢屬靈谷寺。大均說「梅花因太祖」，蓋本明初建孝陵而遷寺之掌故，由寺而及梅。詩家因事生文，自是慣技。這一轉化，頓使「梅花」與明室扯上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水」一句用鍾山八功德水典故。相傳梁天監中有胡僧飛錫止鍾山修行。山龍現，遺僧一泉，其水清、冷、香、柔、甘、淨、不餧、蠲癆，後遂名八功德水<sup>32</sup>。在頌聯中，「梅花」與「香水」相對，「太祖」與「神龍」相對，自極工切。而龍亦君象，藉著聯語建立的表面邏輯關係，原屬前代的山龍、八功德水故事，亦納入明祖與靈谷寺的象喻系統中。

此詩以懷古出之，沉著內斂，前四與五六古今對比。其中自然物象(natural images)暗示明室命運，先盛後衰。第二句寫松，言「蕭森」，言

<sup>28</sup> [明] 焦竑：〈靈谷寺梅花塢〉，同前註，卷3，頁66b，總頁107；又見[清]陳夢雷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卷210〈草木典·梅部〉，頁66861；前二首又收入[清]張玉書等編：《佩文齋詠物詩選》(臺北：廣文書局，1988年)，第16冊，頁5283。

<sup>29</sup> 焦竑：〈遊靈谷寺〉，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頁66b-67a，總頁107-108。

<sup>30</sup> [清]余賓碩：《金陵覽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a-4b，總頁256-257。余書多用古文本字，今逕改今體，下引余書同。余賓碩字鴻客，余懷(澹心，1617-?)子。大均與余賓碩友善，有〈贈余鴻客〉、〈重至白門宿余鴻客山堂作〉詩。參汪宗衍：《汪譜》，頁1915。靈谷寺藏有明太祖畫像摹本，顧炎武有〈恭謁高皇帝御容于靈谷寺〉詩(1653)。明太祖畫像原藏孝陵，後鍾山諸寺每有摹本。顧詩見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58。

<sup>31</sup> 屈大均：〈靈谷寺〉，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10。

<sup>32</sup> 參[宋]梅摯：〈八功德水記〉，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頁15b-16a，總頁82。

「十里」，氣象萬千，象徵明全盛時<sup>33</sup>。接以梅花、香水一聯，使花與寺共沾聖恩。五六卻急轉。此際煙雨、草木無情，宮城、輦路，只見愁雲慘霧，暗寫明亡之後。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詩末哀嘆朝代更迭乃歷史規律。詩前半焦點在明，後半轉向一種普遍性（universal）的感慨，構體是懷古詩習見。然懷古體亦有容許作者不與所懷之古保持情感距離的可能，文體常規不一定能充分解釋他為何不從靈谷寺切入，抒發其明遺民的情意。這裏，大均似乎找到更能讓他全力以赴的載體（vehicle）和更便捷的結構（poetic structure）。那是梅，大均以詠物詩表之。（關於懷古與詠物二體的特徵，下文會再討論。）

靈谷寺既與孝陵有著菟絲附女蘿的關係，靈谷的梅也就以皇家物事的形象出現了（幾乎無需架設理論性的轉接）。大均〈靈谷探梅〉一題三首 1659)<sup>34</sup>，其一說：

往日園陵畔，千株間白雲。芳馨靈谷寺，灌溉羽林軍。

亂點鍾山翠，爭銜麋鹿群。高皇多手澤，如雪日氤氳。

此首與〈靈谷寺〉互文（intertextualized），都以「往日」起筆，二篇首二句跨行，構體亦大同。但〈靈谷寺〉以昔之盛對比今之衰，此則留駐在明盛極之時。此詩意象生趣盎然。首二句喚起〈靈谷寺〉發端相近的景象，千樹梅花，白雲靄靄，形容茂豫。「芳馨」、「灌溉」一聯造句頗奇，詞意似續似斷，背後可能有另一個關於靈谷寺的典故。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欽命牧馬所千戶周某說：「去與靈谷寺，著空閑地，著看山軍，種各樣果子。下種成樹秧，移將進山裏去栽。剩下的結果子，與和尚喫。」<sup>35</sup>孝陵一帶守衛，屬南京親軍衛指揮孝陵衛<sup>36</sup>。這裏種果子的「山軍」未必是「羽林軍」，大均是因孝陵而及靈谷寺，概言之也。其用心，當在以「羽林軍」渲染明初軍威之盛。五六句想像鹿群在鍾山

<sup>33</sup> 鍾山舊多松。余賓碩鍾山詩注說：「晉宋時詔刺史太守罷官各栽木千本，數百年間層松飾巖，列柏綺望，鼎革後斬伐都盡。今一望白涼草，離離蕤蕤耳。」見《金陵覽古》，頁4a-5a，總頁 257-259。

<sup>34</sup> 屈大均：〈靈谷探梅〉，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 111。

<sup>35</sup> 萬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欽錄集〉，頁 23a-b，總頁 62。類似欽命尚有數項，散見〈欽錄集〉。又可參〔清〕謝元福：《靈谷禪林志》，收入白化文等編：《中國佛寺誌叢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第 29 冊，頁 121-123。

<sup>36</sup> 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76〈志五十二·職官五〉，頁 1864-1865「南京守備」條。南京守備下有親軍指揮使十七，中有孝陵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等。大均「羽林軍」云云，當本此。

的翠微爭食，益添詩中的生氣。這樣的氛圍延續到詩的結尾。第三聯轉處插入高皇（明太祖）的「手澤」。明太祖不以文德見稱於史，但靈谷寺昔時的確存有他的「手澤」。明呂柟（1479-1542）有〈遊靈谷記〉，其中說：「北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高祖七敕，備言裁種松竹、果子之山，禁止芻牧。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清濬者，益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所造甚遠，非偶然也。」<sup>37</sup> 大均在上面以「羽林軍」褒揚了太祖的武功，至此以「手澤」表彰其文治。

此首與〈靈谷寺〉最大的分別在於〈靈谷寺〉下半明顯寫明社之既屋，此首則想像明室猶虎虎有生氣。

其二：

見說鍾山麓，當年萬樹斜。誰將遼海雪，來折漢陵花。

冷月含邊笛，陰風散暮鴉。數枝當輦路，不忍吐瑤華。

如上二首，此詩起二句予人宏邈的觀感。鏡頭拉遠，視野從上首的「園林畔」搖至這裏的「鍾山麓」，故言「萬樹」。此首與〈靈谷探梅〉其一不同之處，在於時間的指涉以及相隨的史事。其一結穴於明初，此則在明亡之後。是以語調至此一轉而為悲愴。三四二句破空而來，「遼海」與「漢陵」對立，膽氣雄矣，意指滿清與朱明——遼海之雪喻自滿州遠來的清人，邪惡的力量；漢陵之花，自是為其摧折的明室。這裏明朝與漢族是等同的。言「折」，則大均情感上認同於明室不言而喻。至此漢滿／華夷／內外對立的局面於詩中確立。五六二句承此而來，無論意象、音色，俱屬冷調子。其中「含」、「散」宜以及物動詞看，繫連「冷月」（主語）、「邊笛」（賓語）、「陰風」（主語）、「暮鴉」（賓語）。十字字字皆實，緊湊的「主動賓」句法在這裏釀造了一種緊張、壓抑、淒惶的氣氛和感覺。這之後筆鋒帶開，回顧梅花以收束全詩。我們記得〈靈谷寺〉中的莓苔無情地鋪蓋「輦路」；這裏「輦路」旁的梅樹如何？靈谷的梅彷彿如痛愛明室，「不忍」開花遮蔽御道。這種明遺民意緒詩化的表現在〈靈谷探梅〉其三中更淋漓盡致：

幾樹傍朝陽，猶承日月光。白頭宮監在，攀折薦高皇。

上苑櫻桃盡，華林苜蓿長。春風空有意，先到獨龍岡。

<sup>37</sup> [明]呂柟：〈遊靈谷記〉，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頁33b，總頁91。明太祖詩題〈御製山居律詩十二首賜靈谷寺左覺義清濬〉，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1〈御製集〉，頁44b-47a，總頁40-42。

此首寫當下時空。第二句中日月二字在明遺民作品中常為一諺語，指明朝（日十月）之明<sup>38</sup>。言「幾樹」朝陽門旁的梅猶承「明」之光，就是說這些殘存的梅樹雖在少數，猶倦戀明室。（「朝陽」大均自注為門名。陽亦君象。）「白頭宮監」自有前朝遺民之意，猶上朝陽門旁的幾樹梅花。「薦高皇」，則明祚已絕，猶不忘供花明祖，懷舊忠誠兼而有之。上苑與華林是王家園囿，如今櫻桃落盡，苜蓿亂長，一片國亡景象。「苜蓿」（句六）無情，「春風」（句七）卻仍有意。我們記得，靈谷寺原在鍾山西南坡獨龍崗，後明室營孝陵於此。說獨龍岡，孝陵呼之欲出。春回時風先上獨龍岡，亦倦戀思慕明室的意思。全詩纏綿悱惻，婉轉曲折，「幾」字、「猶」字、「在」字、「先」字最妙。

本題三首詠梅詩的歷史指涉為明、清二朝更迭事無疑。上言靈谷寺可視作明初建國論述的一部分，並觀察過靈谷寺及其梅花與明孝陵、太祖敕令的密切關係。大均「誰將遼海雪，來折漢陵花」的感喟自可循這歷史脈絡理解。而究其實，靈谷寺的歷史和文化記憶本就隱藏著一個「華夷」之辨的潛文本（sub-text），其本源是明太祖御製有關靈谷寺的二篇文章，以及其背後的政治意蘊。明開國後四年（1371），太祖於蔣山寺（即後靈谷寺）建廣薦法會，以超度元、明之交死非正命的軍民。明太祖親撰〈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以紀其事<sup>39</sup>。我們不懷疑這場法事和這篇文章嚴肅和虔敬的宗教意義；明太祖欲為元、明之交的禍亂寫下一個肅穆而超越的句號。這是一個善良的願望。但除此以外，我們亦看出，明太祖此舉另有政治目的。明太祖是藉此強調明朝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賦予他的治權普世的意義（a universal significance）。文首即說：

朕觀二儀有象，覆載無窮。凡中國之人及化外之夷，獲安于世者，莫非陰陽為之表裏。何為陰？何為陽？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庶民，凡生天地，能動作運用者，此之謂陽。天子郊祀天地、祭嶽、鎮海瀆，諸侯祭境內山川，庶民祭祖宗，皆求其神：有名無形，有心無相，此謂之陰。故中國與化外之人，所敬之心則同，所祀之禮則異。觀自古至今相傳祭祀鬼神之事，豈不重乎？然事鬼神必有禮、有時，毋犯分、毋越禮、毋非時、毋昧

<sup>38</sup> 參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學術研究》1994年第6期，頁131-133。朱文第一節論「日十月=明」，即引大均六詩為例。

<sup>39</sup> [明]朱元璋：〈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頁5a-7a，總頁77-78。此場法事又可參[明]宋濂：〈蔣山寺廣薦佛會記〉，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頁33a-36b，總頁86-87。

於鬼神。若昧於鬼神，則爲鬼神亦難矣。

明太祖一口氣從二儀、陰陽說到中國之人、化外之夷、天子、大臣、庶民、天地、山川、海瀆、祖宗、鬼神，大有普天之下，莫非明土，率土之濱，莫非明臣的氣概。這次法會所欲超渡的對象，即不限於在中國境內死於非命的軍民，還包括「我朝大軍，征討四方，遠入它境」時所殺害的「平民」、「老幼」、「殘疾」。文章稍後，明太祖說：

然吾觀古書，孔子有言，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則佛者，豈特中國所敬，雖化外尤尊。

表面上，明太祖於此讚揚「化外之夷」亦崇尚佛法，但接著他即備言他如何不昧於佛，事鬼神以禮、以時，且非求己福，乃爲臣民。其目的，仍是強調其德及其統之光明正大。後蔣山寺有遷寺之議，明太祖命太師李善長詣山擇地，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建址，並遣犯工五千餘人以爲役。靈谷寺建寺的緣起與完成後的壯觀無乃明初經營帝都的一環節。洪武十六年（1382），靈谷寺告成，明太祖爲撰〈御製大靈谷寺記〉<sup>40</sup>，開首說：

朕起寒微，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邇寶志之刹。其焚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敕移寺，凡兩遷方已。

靈谷寺的歷史是放在他統一華夷、定鼎金陵的建國宏偉敘述（grand narrative）以及對明室永恆運命（immortality）的考慮來形容的。次年（1383），徐一夔奉命撰〈奉敕撰靈谷寺碑〉<sup>41</sup>，即於文中表出明太祖遷建靈谷寺有把寺院典章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的企圖：

皇上龍興，承中華之正，統天地神人，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爲之略，舉百王之墜典，而一新之，貽聖子神孫萬世之法。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不存古制，聖慮及焉。比因僧仲義之請，改建志公之塔寺。遂本佛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者，起居食息，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

總而言之，靈谷寺與明朝王室的關係非比尋常，靈谷寺生於皇權的延伸，不妨視作王室某些面相的隱喻。明乎此，我們方可瞭解，爲何上述三詩中，梅的取象是外向性的，靈谷寺的梅面向鍾山和孝陵所喚起的明朝天下。大均的梅觀照周

<sup>40</sup> 朱元璋：〈御製大靈谷寺記〉，同前註，卷3，頁7a-8b，總頁78。

<sup>41</sup> [明]徐一夔：〈奉敕撰靈谷寺碑〉，同前註，卷3，頁19b-23a，總頁84-86。

遭，俯仰今昔。它被放置在宏觀的視野中取義，其象徵意義成就於它與其他物象的相對關係，而這些物象多指向明興和明亡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情態。如上論不謬，靈谷寺是明祖「統一華夷」論述的一部分，大均現正處於這充滿歷史暗示的境地中，他所抒發的「遼海雪」、「漢陵花」的感慨便更見沉痛了。大均目睹的明、清之際的鍾山無異一個歷史反諷（irony）：明祖於此建立的以「華」統「夷」的世界已破滅，於今「遼」（夷）已折「漢」（華），靈谷寺和它的梅花雖猶在，畢竟是殘山剩水的意態了。事實上，靈谷寺於順治二、三年間（1645-1646）毀於火（其因不詳），僅志公塔、無量殿倖存。大均所見，絕非靈谷寺昔時峻宇修廊的氣象<sup>42</sup>。康熙三年（1664），王士禛有〈題靈谷廢寺〉詩，下半章說：

王舍城中荒草遍，樂遊原上野麋春。志公衣履今還在，苑外悲風臥石麟。<sup>43</sup>

靈谷寺入清以後的蕭條，大均、余賓碩與王士禛等的描繪是一致的。大均詩所喚起的明初盛況，是歷史的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明矣。

### 三、擬人、擬物、身分——古梅與明遺民情境

〈吉祥寺古梅〉一題七首，成於同年（1659）<sup>44</sup>。大均曾說：「吉祥寺古梅，爲金陵第一。」<sup>45</sup>相對於靈谷寺，吉祥寺沒有顯赫的歷史或雄偉的建築，卻以「幽勝」見稱<sup>46</sup>。吉祥寺有拜梅菴，余賓碩有〈拜梅菴詩〉並注，注記吉祥寺及其古梅如此：

西北抵定淮門，又南，過金陵寺，出華嚴嶺，升降山阜，緣古林菴，又西，入吉祥寺。寺後高原，有古梅一株，枝鐵幹，扶疏十畝。歙人鮑元澤偶經其地，望梅迎拜，因建拜梅庵。<sup>47</sup>

<sup>42</sup> 可參〔清〕胡鎬：〈重建聖師塔記〉（1816），收入謝元福：《靈谷禪林志》，頁92-93。

<sup>43</sup> 〔清〕王士禛：〈題靈谷廢寺〉，見王士禛著，〔清〕惠棟、〔清〕金榮注：《漁洋精華錄集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頁308。

<sup>44</sup> 屈大均：〈吉祥寺古梅〉，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11-112。

<sup>45</sup> 屈大均〈過蔡國子園亭作〉「海棠一樹自清涼，復有梅花似吉祥」句下自注，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516。

<sup>46</sup> 參焦竑：〈重修吉祥寺碑〉，收入曹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5，1a-3b，總頁254-255。

<sup>47</sup> 見余賓碩：〈拜梅菴〉，《金陵覽古》，頁47a，總頁343。余詩亦頗可一讀：「吉祥寺裡

可以想見古梅之魁奇<sup>48</sup>。吉祥寺幽勝，其梅古奇，本題七首詠梅詩亦展現一個內轉（inward turn）的視境，整組詩充滿內省（introspection）的意味。大均用擬人法把吉祥寺的古梅寫成明遺民，又用擬物法把自己寫成古梅，藉古梅呈顯明遺民的主體性。

其一：

受命生南國，孤根不可移。寒光含雨雪，元氣在茅茨。

空寂無人見，芳馨只自貽。上林松柏盡，珍重歲寒期。

起二句脫自屈原〈九章·橘頌〉：「后皇嘉樹，橘綰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王逸注說：「南國，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sup>49</sup>以「深固難徙」象徵屈原的「忠信」。大均「受命」、「孤根」二句，分明轉化自屈子詩文及王逸《章句》，則忠信於君國，自是命意所在。「不可移」是就精神而言。蓋橘過淮而為枳，梅則基本上江左江右、嶺南嶺北都能活。其不可移者，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南國」，傳統詩文取江南義，惟明清之際，於遺民作品中往往暗指南明諸朝（請詳下文）。

吉祥寺的古梅無疑是明遺民的寫照。〈橘頌〉與遺民意志亦有密切關係。屈原是這樣結束對橘的頌美的：「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sup>50</sup>韓愈讀後說：「伯夷者，特立獨行，萬世而不顧者也。屈原獨立不遷，宜與伯夷無異。」<sup>51</sup>雖然屈原本旨為頌揚伯夷的高潔，義不食周粟，但伯夷亦為商朝遺民，是故後世稱舉伯夷，每取特立獨行和不事二主雙重意義。伯夷、

---

拜梅菴，老樹婆娑倚石龕。不分寒香生月下，大都春色在江南。長吟莫漫逢何遜，按拍須知訪薛譚。我欲攜華底坐，霏霏晴雨帶煙嵐。」

<sup>48</sup> [宋] 范成大《梅譜》說：「古梅會稽最多……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緣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歷久風日致然，詳考會稽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非必古木。」見陳夢雷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卷205〈草木典·梅部〉，頁66818。惟大均這裏所詠的是真正的「古」梅無疑。

<sup>49</sup>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3。

<sup>50</sup> 同前註，頁155。

<sup>51</sup> 見洪興祖：《楚辭補注》引，頁155。伯夷，孤竹君子。父欲立伯夷，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隱於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以忠孝。左右欲殺之，太公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死。事見《史記·伯夷列傳》。大均有〈書伯夷傳後〉一文，其中說：「夷齊者，民也。商之臣子皆不能為故君而死者，以非民也。」見《翁山文外》，卷9，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159。

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為歷代遺民所欽仰。夷齊之典，在明遺民作品中比比皆是。

〈橘頌〉點題之後，即詠橘之根深堅固，大均此詩點題後，亦即頌梅樹的根柢，但不言深，言「孤」，有深意焉（雖然「孤根」本詠梅習用語）。言「孤」者，大有孤臣孽子孤忠的意味，表相遺民孤貞的志節。〈橘頌〉在根之後，接而詠美橘的花葉，大均則從另一角度，在頌聯繼續寫根，謂其雖雜廁茅茨，仍秉天地之元氣。此語用意極深。大均在他的《廣東新語》裏，曾論梅花的發生與天地元氣消長的關係。他說：

梅花惟嶺南最早，冬至雷動地中，則梅開地上，蓋其時火之氣下<sup>52</sup>足於地，而發其最初之精華，故梅開。水之氣上足於天，而施其最初之滋潤，故雪落。雪，洩也。從肅殺之中，洩其一陽之精，以爲來春之生生者也。雪深則水氣足，梅早則火氣足。火氣足而爲天地陽生之始，陰殺之終，使萬物皆復其元。梅之德所以爲大。

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sup>53</sup>，得春獨早，故群卉資之以爲始。斯時也，天地一陽之復不可見，見之於梅，梅其得氣之先者也。故欲見天地之心者於梅，欲見梅得氣之先者於粵。<sup>54</sup>

這裏說的雖是嶺梅<sup>55</sup>，但其中論梅與陰陽水火雨雪的關係，推之於江南的梅，似無不可吧。最重要的，是大均把梅視作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媒介，能使萬物恢復其元氣。既然我們已經說到象徵和寄託的層面，不妨接著想，這跟遺民的處境有無相似處？清順治朝到了第十六年，即明祚已絕十六年（南明弘光朝亦已亡了十五年），此際歸退山林，或廁身漁樵、醫卜、傭保、僧侶之間的明遺民，不也就像大均筆下的「孤根」嗎？如這說法成立，則大均對他們（及自己）所寄予陰陽剝復的厚望，便極不尋常了。

頌聯轉詠古梅之孤高與芳香。「芳馨」是〈離騷〉習語，芳草嘉卉，以喻君子美德。這裏轉用到古梅身上，讓我們想到〈橘頌〉的另一段文字。屈原說橘年

<sup>52</sup> 別本作「不」，當從今本。

<sup>53</sup> 一之日指農曆十一月，二之日指十二月。《詩·豳風·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傳》、《疏》以「一之日」爲周曆正月。

<sup>54</sup>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5〈梅〉，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4冊，頁562。

<sup>55</sup> 大均康熙十九年（1680）有〈嶺梅〉一首：「嶺梅冬已發，香總在南枝。霜共黃花濕，風兼絳葉吹。雖寒無雪覆，即早有鶯窺。隔歲春光滿，江南殊未知。」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534。

歲雖少，但特立獨行：「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洪興祖《補注》說：「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sup>56</sup>大均說吉祥寺古梅遺世獨立，「無人見」，其芬芳「只自貽」，大有此意。此之所以難能可貴，須合詩的結句來看，方顯得意味深長。「上林」<sup>57</sup>（句七）猶上〈靈谷探梅〉其三的「上苑」和「華林」，王家樂遊之地，喻王室。松柏枝葉繁盛，經冬不凋，故《論語·子罕》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後以喻志操之貞潔與恆久。大均此處卻反言松柏已盡，表面上哀嘆王室陵夷，而隱隱然寄寓往昔忠於王室之士均已凋喪，或業已變其志節之意。如此，益見此古梅「孤根不可移」的難得。此詩結句高妙，另起一意，把前面較為抽象的指涉，歸結到明清易代之事。

其二：

一夜東風拂，春回半死根。瑤華答霜雪，碩果孕乾坤。  
豈有山川秀，居然鸞鶴尊。惟應招隱士，來此日攀援。

其三：

枝枝經百折，終不畏冰霜。到地花仍發，橫空影自長。  
月中那可得，人外始聞香。夜夜難爲寐，因君拂石床。

其二、其三宜合觀，以二首皆詠古梅的復生。（吉祥寺的古梅雖非枯梅，但大均說它的根已「半死」。）其二起二句即點出重生之主題，領聯順寫此意，描繪春風吹又生，古梅開花結果。花言「瑤華」，既體物以狀其色，復喻其高潔<sup>58</sup>。寫果最奇，言「碩」，言「孕乾坤」，後者非前者濡染之筆，興寄匪淺。屈原稱美橘之德行可參配天地，通之神明：「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在大均筆下，吉祥寺的古梅比諸橘不遑多讓，故說它的果實孕育乾坤。這裏的「乾坤」即上述其一的「元氣」<sup>59</sup>。

<sup>56</sup>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54。

<sup>57</sup> 上林，秦舊苑，漢武帝時擴建，周圍至三百里，有離宮七十所，苑中養禽獸，供帝春秋打獵。漢武以武功著於史，大均這裏用上林一語，或非泛舉，似有懷念明代軍事尚盛時之意。

<sup>58</sup> 屈原〈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章句》：「瑤華，玉華也。」洪興祖《補注》：「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0。

<sup>59</sup> [明] 王冕〈墨梅〉詩說：「我家洗硯池邊樹，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雖云「清氣」、「乾坤」，意趣卻大有不同。見張玉書等編：《佩文齋詠物詩選》，第16冊，頁5302。

其二所詠的焦點是古梅的花果，其三則是它的枝葉，而復生仍是背後的意旨。其三的第一聯讓我們聯想到〈靈谷探梅〉其二的「誰將遼海雪，來折漢陵花」。吉祥寺古梅歷經百折，故不畏風霜。上論〈靈谷探梅〉中所受摧折的是明室，此地被磨折者，則宜以明遺民視之。頷聯首句正寫復生，次句逆接首聯的樹枝，狀其橫空出世的意態。說它們的影子長大，寓德厚流光、影響深遠的意思。

其二、其三除了復生之主題外，尚有另一主題：隱逸。復生與隱逸在大均筆下，是息息相關的。其二頸聯說古梅如得山川之秀，儼然有鸞鶴之尊。鸞鶴為仙人所乘，於古詩文並舉借喻仙靈。在本詩的語境中，取避居世外之義<sup>60</sup>。收二句承此意而直書胸臆，欲招邀隱士以為知己同志。而〈招隱士〉固亦《楚辭》篇名，其末段說：「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闢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sup>61</sup>以山中多患害，難隱處，招隱士來歸。大均則反用其意。意者天下喪亂，王室板蕩，唯是山可以居，唯是梅可以親，應招邀隱士同來，日夕攀援。韜蔽其光，其光彌明。保真以冀復生，是大均措意所在。其三頸聯亦寫這境界的珍貴，唯於人外之域，可以得之。說「香」，自然是屈子芳草美人以託君子的意思。

由明入清，士大夫面臨的一大抉擇，即仕與不仕。出或處，對許多人來說，是大是大非的關節。大均終身不仕清，是選擇了處這條路，這與他父親的訓勉是很有關係的。順治三年（1646），大均十七歲。十二月清兵陷廣州城，大均父攜家返番禺故居，命大均曰：「自今以後，汝其以田為書，日事耦耕，無所庸其弦誦也。吾為荷蓀丈人<sup>62</sup>，汝為丈人之二子。昔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荒之有<sup>63</sup>，神夏之亡，有甚於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身，所以存大倫也，小子勉之。」<sup>64</sup>瞭解這個背景，有助我們體會為何大均在詩裏亟口稱揚吉祥寺古梅之

<sup>60</sup> [唐]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云：「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群。」近此義。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卷144，頁1454。

<sup>61</sup>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234。

<sup>62</sup> 《論語·微子》載：子路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sup>63</sup> 龍荒原指匈奴所居漠北之地，後喻諸「胡」，此處當借指清人。

<sup>64</sup> 屈大均：〈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翁山文外》，卷7，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137-138。關於明遺民的出處問題，可參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53-124；又氏著：〈明遺民對出處的抉擇與回應——陳確個案研究〉，《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頁95-140。

遺世獨立、潔身守道。但我們要注意的是，大均隱匿世外，非爲獨善其身。而是在他看來，時來之運未至，特韜光俟奮耳。故本年稍後，鄭成功以舟師圍南京，大均很有可能曾參與其事。鄭師無功而退，大均即避地山陰、桐廬，達兩年之久<sup>65</sup>。可證。及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亂起，大均自粵北入湘從軍，與吳三桂言兵事，受廣西按察司副司一職，監督安遠大將軍孫延齡軍<sup>66</sup>。比諸順治十六年陰助延平，大均此舉尤可見其心跡，更爲大膽。

我們回頭看吉祥寺的古梅。

其四：

山中長自傲，不愧此寒饑。冰雪歸玄鬢，乾坤寄縞衣。

朝隨晴日放，暮作白雲飛。一自冥心坐，聞香每發機。

其五：

白雲開半樹，香已遍晴春。明月曾無夜，空山豈有人。

風驚飛瀑斷，雪灑落花勻。坐久石床暖，氤氳一氣新。

其四、其五興象如畫，景中見情，承上寫幽棲山中，寧靜致遠的境界。語調於全組詩中最爲閑雅從容。其四前三聯彷彿大均自語，藉古梅之口道己之情志，物我渾然一體。古梅／大均之所以能「自傲」於山中，端在自好自尊，不愧「寒饑」。二詩意象設色素白—冰雪、縞衣、晴日、白雲、明月——象其素心，予人清遠空靈的感覺。其四頸聯最能表現這種率性自在的心境。梅花固然不會在早上陽光中突然綻放，只是在陽光的映照下，更見鮮麗奪目，故如初放。天色漸暗時，花便不會那麼顯眼了，故好像隨白雲一起褪去<sup>67</sup>。「隨」字、「放」字、「作」字、「飛」字締造了一切都隨意，天地萬物，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的意境。其五頸聯首句說「風驚飛瀑斷」，驟觀或嫌造語、取境過於奇特，但細思這亦自然界可見的景象，自無不可，無損詩中幽閑的氣氛。而且此聯次句即寫動態中極靜之境——雪如落花勻勻鋪滿大地<sup>68</sup>——緩和了上句稍覺緊張的觀感。

二詩緩緩流淌的時間亦增添了寧靜恬淡的感覺。「長」、「朝」、「夕」、

<sup>65</sup> 參汪宗衍：《汪譜》，頁1877-1878。

<sup>66</sup> 同前註，頁1924-1930。

<sup>67</sup> [梁]簡文帝蕭綱〈侍遊新亭應令〉詩有聯曰：「柳葉帶風轉，桃花含雨開。」造句近此，惟不及大均此聯之靈巧自然。蕭詩見〔宋〕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34冊，卷179，頁595。

<sup>68</sup> 或可讀爲雪灑而令花落，鋪滿大地。但我比較喜歡上面的意境。

「一自」、「已」、「久」等語都透露著這個消息，而以二詩的第四聯最能體現這一特徵。其四暗示一個過程：從「冥心」而坐，到「聞香」而興會潛發。此中物理性的時間或長或短，但精神上絕對是一邈遠、豐盛之旅。其五意思比較顯白：久坐石床，到床轉暖。這時間自然不會短，幾乎可以用物理性的時間來量度（如若干炷香、若干盞茶）。次句說空氣氤氳、新潔。因承上句而來，讓人覺得這是久坐石床的結果，也增加了時間漫衍的感覺。

大均本年另有〈紫峰閣梅〉二首<sup>69</sup>，詩的意境與上述二首相近，錄如後：

其一：

絕壑春難早，鴻濛養有餘。光生無月處，香在未花時。  
入石僧同定，橫溪客自疏。年年紫峰閣，爲爾一踟蹰。

其二：

夜夜空林裏，相看凍不歸。坐殘千嶂雪，添盡五更衣。  
結侶如園綺，爲餐當蕨薇。無人愛幽獨，于此共忘機。

這裏的「園綺」用漢初商山四皓的典故，強調隱士的清高<sup>70</sup>。「蕨薇」並舉，自然是用《詩經·召南·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語。但用意則不在〈草蟲〉的蕨薇，而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的遺民志節。在這個語境中，隱逸與忠義是相輔相成的。

下面我們討論〈吉祥寺古梅〉最後二首：

其六：

巉巖山寺裏，鐵幹欲爲薪。殘月疑山鬼，深雲隔美人。  
無花留太古，何草似靈均。再弄枝下，江南久望春。

其七：

一樹凌空白，孤心與我期。先春天未覺，入夜月難知。  
不食同姑射，無香到楚詞。憑君念寒歲，莫折向南枝。

上述其四、其五舒緩的節奏、語調至其六、其七一變而爲蒼涼悲慨。二詩洋溢著焦慮、憂憇之感。組詩至此寫吉祥寺古梅的樹幹、樹體。如細心觀察，我們會發現，上述其一至其五都著眼於古梅比較不顯眼或不恆久的一面：樹根、枝葉、花

<sup>69</sup> 屈大均：〈紫峰閣梅〉，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12-113。紫峰閣在今南京市北栖霞山上。

<sup>70</sup> 四皓漢初隱於商山，以鬚眉皆白，故稱四皓。高祖屢召不應。後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迎四皓，乃出輔太子。

果、芬香。相對而言，樹幹四季外露，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對外界的威脅只能逆來順受。更不妙的是，古梅不像《莊子》書中的無用之樹，可免斧鉞之加。古梅有一「鐵幹」，可淪為樵者的柴薪。其六頸、頸二聯，其七頸聯多用《楚辭》語。其六的「山鬼」是〈九歌〉篇名，而「美人」是《楚辭》熟見的託喻意象，亦讓人聯想到〈九章〉的〈思美人〉。但揆諸詩意，大均未必取《楚辭》諸篇原旨，而是借用「山鬼」、「美人」當下的視覺效果，釀造緊張、悽惶的氣氛。其六頸聯充滿鬼氣。「殘月」、「山鬼」使人恐怖，「深雲」隔阻「美人」，令人焦灼。頸聯承此而深化，詩意由象而至喻。無花能從太古活到現在，這是對眼前古梅的憂灼，恐其不久即臨大難。「何草似蠶均」一句甚奇，以古梅不能比擬屈原。這是焦慮古梅歿後不能流芳於世，隱然大均自指了。此聯構思與其七頸聯相似。其七頸聯首句謂古梅如仙子姑射（出《莊子》）一般美好，但恐歿後便湮沒無聞，因為次句接著說，〈離騷〉盛美芳草嘉樹，以喻君子，卻不及梅。

大均於整組詩中，以在其七的出現最為直接，句二言古梅的「孤心」與「我」相期許。「孤心」讓我們想到上述的「孤根」。其七寫古梅即著眼於此一「孤」字——「一樹」、「孤心」、「天未覺」、「月難知」、「不食」、「無香」，這種種描繪締造了一強烈的遺世獨立的孤絕感。到最後大均乾脆把古梅神而化之：古梅「凌空」欲飛，璀璨奪目。它不受大自然規律的支配，早於春天降臨大地；到了晚上，連月亮亦難以察覺它的存在。它「不食」，如同仙子。它的芬芳甚至無載於《楚辭》。

吉祥寺古梅儘管蠶異如此，但如其六所說，「鐵幹欲為薪」，對於人類的加害，它始終是無能為力的。其七結句最意味深長。首句「憑君念寒歲」，是深情款款與古梅話語。次句卻突然調整了訴說的角度，幾乎是向讀者懇請：「莫折向南枝」。梅枝向南者得春最早，故傳統視為春信<sup>71</sup>。但「向南枝」（不一定指梅，可以是其他花木）在明清之際詩文中，每每是遺民效忠明室（南朝／南明）的象徵。茲舉數例為證。夏完淳（1631-1647）〈旅夜聞雁〉（1645年以後，1647年以前）結句說：「平生湖海意，三繞向南枝。」白堅箋說：「示嚮往浙、

<sup>71</sup> 例如南宋詩人易士達〈梅花曲〉其二：「春腳移從何處來，未到百花先到梅。南枝初著三兩，北枝泣寒猶未開。」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72冊，頁45238。

閩南明抗清政府。」<sup>72</sup>顧炎武以「越鳥」、「南枝」、「南國」命意寫〈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1648)：

微物生南國，深情繫一枝。寒風群拉沓，落日羽差池。  
繞樹飛初急，尋柯宿轉遲。懸冰驚趾滑，集霰怯巢危。  
路入關河夜，思縈嶺嶠時。山川知夙性，天地識恩私。  
向日心常在，隨陽願未虧。寄言幽谷友，勿負上林期。<sup>73</sup>

王冀民箋說詩意甚明：「宋、明俱亡于北，其臣皆寄心于南，故文信國集名《指南》，鄭思肖易名『所南』，先生詩亦賦『巢南』，三賢寄慨，異代如一，況未酬隨陽之願，空餘繞樹之悲亦復同乎！此詩但詠鳥而未言何鳥，……然隨陽、向日、恩私、上林諸詞俱兼君臣之義，則所云『巢南』必非前人泛泛思鄉之作，時隆武已殂、魯王入海，論者皆謂先生寄意于永曆，其或信然。」<sup>74</sup>本年七月，鄭成功師潰南京城下，退守鎮江，錢謙益〈後秋興之二〉其八說：「駝馬巴臨迤北路，砲車猶護向南枝。」以「向南枝」喻鄭明水師<sup>75</sup>。

綜上所述，大均之所以孜孜不輟，反覆詠梅，是因為大均以梅為前代遺物，可以引發故國之思，而梅的品質又與明遺民有相似之處，可藉而歌頌明朝遺民。大均本年尚有〈福興山中古梅〉二首(1659-1660?)<sup>76</sup>，即表出另一株古梅作為「先朝物」的特殊意義，詩意可與上論種種相發明：

其一：

念是先朝物，風雷不忍侵。桐焦空有尾，竹老已空心。  
以道酬泉石，無言閱古今。幾宵明月上，爲子動瑤琴。

其二：

一花開混沌，靜者最先知。雪滿空山枝，雲生絕壁時。  
幽光溪四照，素影鶴相持。辛苦傳春信，陰風莫太吹。

<sup>72</sup> [明]夏完淳著，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47-248。

<sup>73</sup> [清]顧炎武：〈賦得越鳥朝南枝用枝字〉，見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頁130。

<sup>74</sup> 同前註，頁131。

<sup>75</sup> 潘重規：《錢謙益投筆集校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頁9-10。請參拙著：Chi-hung Yim, "The Poe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 Study of Qian Qianyi's(1582-1664) Later Poetry,"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162-163。

<sup>76</sup> 屈大均：〈福興山中古梅〉，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13。

《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的箋校者指出，〈吉祥寺古梅〉其六、其七《翁山詩外》失收，該書編者從《道援堂詩集》和《國朝詩乘》二集錄回<sup>77</sup>。「失收」自然可能，但如上文所述，其六、其七於全組詩中情辭最激切，《翁山詩外》刊刻時考慮到詩意或犯時忌而刪去，也甚有可能<sup>78</sup>。

細檢大均存世全部詩作，詠物者甚夥，而詠梅尤為大宗，不止於本年之作。但是我們發現，大均再沒有像上述那樣處理過梅，能讓我們從詩篇出發，建立堅實的歷史象喻系統，並處處感受到大均的身世、家國之感和遺民情思。這裏不妨引錄幾首非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以作參照。大均〈梅花〉七首（1694以後）其二說：

搖落亦未久，梅花今又芳。數枝已光艷，一見即清狂。

相對至斜月，無眠空石床。美人憐獨立，霜濕綺衣涼。<sup>79</sup>

〈對梅〉一題含三十九首（創作年份不可考），茲錄四首於後：

花含太古雪，一片已寒人。不是馨香絕，如何答好春。（其二十）

一夕春風動，花開自不知。無人從太古，識得未香時。（其二十一）

花似香爲教，聞香每發機。春風如有意，吹入客心微。（其三十一）

花開當靜者，無語只馨香。神契誰能似，依依水一方。（其三十二）<sup>80</sup>

我們選錄上面幾首，是因爲其中某些意象與上文討論過的有些相似，而大均愛戀梅的殷切、梅所體現的靈妙亦不下上述諸篇，但是我們也同時可以看出，這幾首的意趣與上文所述的已大有不同了。或曰「美人憐獨立，霜濕綺衣涼」中「獨立」、「露濕」等語不亦可象徵遺民之志潔與艱辛？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無法展開論證。困難有二：（一）詩作的時、地不明，作者的生平事蹟因而亦不能肯定，不能循外證（external evidence）推其作意。（二）詩的意義結構、內部證據（internal evidence）不能直接開出「遺民」志節的讀法。很明顯，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的格調、情韻、內容與南京、鍾山、孝陵、靈谷等地所賦予的歷史情境息息相關。

<sup>77</sup> 同前註，頁112。

<sup>78</sup> 《翁山詩外》版本、流傳問題，可參拙著：〈屈翁山《翁山詩外》版本考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23卷第2期（1990年12月），頁197-212。

<sup>79</sup> 屈大均：〈梅花〉七首其二，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024。

<sup>80</sup> 屈大均：〈對梅〉，同前註，頁1158-1159。

## 四、境地、體物、主體與客體的理論探究

我們上面的解讀呈顯三個主要面相：境地的歷史象徵性、物象的示意功能和詩人情志的寄託。下面我以美國學者 Edward S. Casey 對境地（place）與記憶活動（remembering）的一些哲學性觀察作起點，進一步探析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引發的理論問題。Casey 的專著題為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1987)，是從現象學的角度探討記憶活動的作品，其中第三部分論及「身體記憶」(body memory) 和「境地記憶」(place memory)。我們不妨先思考 Casey 所論，在記憶活動進行中，境地、回憶、身體、事物、情緒、主體、客體的互動情況<sup>81</sup>：

(一)境地、記憶：Casey 認為，境地（尤其是古蹟）在記憶活動中舉足輕重。他指出，亞里士多德曾說境地對人有「活躍的影響」(active influence)，具有「獨特的潛能」(distinctive potencies)；羅馬人重要的地點都有「守護神」(*genius loci*)；英語有「境地的精神」(the spirit of a place) 的說法。而境地的獨特性源於它有誘發記憶的力量<sup>82</sup>。在 Casey 看來，境地對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某一境地鼓勵或容納某些或某種記憶而排斥其他。境地總是具體而實在的。另一方面，記憶亦選擇境地，挑選適當的境地作為它理所當然的處所。境地提供、凝聚各種處境，讓記憶中的行動演發，承載記憶內容，為記憶定位。境地彷如舞臺，俾記憶事件「展演」(*mise en scène*)；它在界限內保衛、儲存過去的情事<sup>83</sup>。Casey 觀察到，境地的功能大類於記憶：它們在基本層次上擔任著一項相似的工作，就是把種種不同類屬的情境鎔治成一臨時統一體。境地能凝聚不同的物事（生物、非生物皆然），把它們「本地化」(regionalizes)，給予它們一個公共空間。境地又能把不同的空間連接起來，造就「社區」(neighborhood) 或「周際」(vicinity) 的感覺。人類的記憶行為，也是把不同的時間片段交織起來，把遙遠的往昔、剛逝的過去，和當下的現在連成一氣<sup>84</sup>。

<sup>81</sup> 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4-215.

<sup>82</sup> 同前註，p. 197。

<sup>83</sup> 同前註，p. 189。

<sup>84</sup> 同前註，p. 202。

**(二)境地、記憶、身體：**記憶與境地密切的互動是透過甚麼中介促成的呢？

Casey 指出，是記憶主體（subject）：在思考記憶與境地關係的脈絡中，不妨以他／她的身體為表徵。身體是心理與物理的統一，它把心理性的回憶行動和境地性的物理特徵連結起來<sup>85</sup>。他援用 Merleau-Ponty 的一個說法來豐富他的論點：「我們必須……避免說我們的身體在空間或時間中。它本來就體現著空間和時間。」（“We must avoid. . . saying that our body is *in space or in time*. It *inhabits space and time*.”）<sup>86</sup> Casey 認為，當我們搬進或通過某境地時，身體把負載著的過去帶進現在的經驗。身體的「本身歷史」（local history）實際上就是一個個場所（locales）。藉著身體，過去成為「我們真正的現在」（our true present），而在參與身體當下的行動時，過去失卻了它作為過去的獨立身分。因為身體行為演出過去，不是描繪過去<sup>87</sup>。

**(三)境地、記憶、事物：**Casey 是這樣建立境地、記憶與事物的關係的：在境地中的事物（material things）負載著境地和記憶的具體內容，藉著它本身的紀念性（memorability）把記憶和境地撮合。事物屬於境地，又在境地之內，是境地理所當然的擁有者。事物充實境地，給予境地內涵，帶來凝視和焦點。循這個角度思考，境地的事物所發揮的功能和身體大有相似之處。一如身體，事物給予它的經驗／回憶者許多切入點<sup>88</sup>。Casey 說：「事物把過去梳理得井井有條；它們是過去在記憶中重要的具體佈置。」（“Things put the past in place; they are the primary source of its concrete implantation in memory.”）<sup>89</sup>

**(四)境地、表情、主體與客體的交融：**Casey 指出，情境交融跟主體與客體的互動關係密切，而境地的一個特徵就是它的表情性（expressiveness）。Lawrence Durrell 曾說：「人類是境地的表情。」（“Human beings are expressions of their landscapes.”）<sup>90</sup> Casey 點出這是因為境地本身就帶有表情，而表情跟情緒（emotionality）形影相隨，境地的表情來於它內在的情緒。個別地方之所以能夠影響或啟迪我們，或惹我們煩厭，因而留下深刻記憶，就是這種

<sup>85</sup> 同前註，p. 189。

<sup>86</sup> 同前註，p. 190。

<sup>87</sup> 同前註，p. 194。

<sup>88</sup> 同前註，p. 205。

<sup>89</sup> 同前註，p. 206。

<sup>90</sup> 同前註引文，p. 199。

內在情緒在發揮它的作用。他認為這種情緒依靠景觀（landscape）表現它的內涵。這些景觀並不暗示或象徵境地的情緒，而是體現（embody）著這種情緒。換言之，景觀訴諸視覺性（visibility）。最富趣味的是，Casey 認為這視覺性不純粹指境地的實際形態（configuration），而是它的光亮，一種好像從物體內部透發出來的光澤（luminosity）。Casey 強調境地的感染力：它可以藉著它透光的視覺性在感觀上、記憶上佔據我們，進入我們的生命，逮著，環繞著，甚至支配著我們。當這發生時，我們陷入它的存在，覺得與境地合而為一，境地在這剎那間亦消失了（*invisible*），消溶在它自己的光澤中。他認為，境地與我兩忘的時刻出現在我們極度喜悅、恐懼或放縱時。在這氛圍裏，我們的身體放棄意識，感覺不到自身的存有了。這是境地的表情性展現得最淋漓盡致的時刻，可遇而不可求，因為各種不同形態的視象傾向於明顯地、持續地存在。當境地與身體融合，各自失卻獨立身分之際，就是境地力量最彰顯的時刻。此際境地終於完全屬於我們。（但在回憶它時，我們仍得借重於它的視覺性。）<sup>91</sup>

中國傳統文學理論涉及詠物體時，多措意於物、我、神的關係，尤其在於所詠之物的情韻能否體現詩人的情志，勝義固多，但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傳統文論沒有照顧周詳：（一）物與其所處的境地的關係，以及物與境地的歷史情境結構；（二）詩人詠物時意識及記憶活動的具體操作，主體與客體的互動情況。我們在下面將會嘗試應用 Casey 的某些觀念，分析大均一六五九年詠物詩在這兩方面的特徵。Casey 談到境地可以有一種好像從內部透出來的「光澤」。其實中國文論可以提供一個比較靈巧的說法：那是境地的氣或神。對境、物、我、神的思考和體會，畫家、詩人、哲學家或異其趣，但同樣深刻。我們讀一段畫論。大均時人名畫僧石濤（1642?-1707?）<sup>92</sup>說：

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峰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峰障之密，識雲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亦非

<sup>91</sup> 同前註，pp. 199-200。

<sup>92</sup> 石濤生年有 1636、1641、1642 說，卒年有 1705、1707、1710、1718 說。大均與石濤友善，有〈石公種松歌〉、〈從石濤禪師乞花插瓶〉等詩。參汪宗衍：《汪譜》，頁 1828。

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sup>93</sup>

石濤這段文字探究的自然是畫家如何捕捉、呈現山川的神韻，但論說中主體與客體、身體與事物、意識與形相的關係，大可與上面所述的現象學理論相觀照。嘗試言之。這裏的山川我們視作自然萬物的體現，是具視覺性、可睹的景觀。上面所述的主體，我們以其身體為表徵，這裏宜為畫家的「一畫」：畫家的筆觸既是身體的延伸，又是主體情志的流露，是心理與物理的結晶（我們不是常說「筆意」嗎？）。畫家透過筆觸（主體），貫通山川的形神（客體）：形態、表情、情緒。石濤說五十年前他未能「脫胎於山川」，造詣未出神入化，這是因為景觀形態的影響力太頑強了，石濤仍「物於物」，只是山川的「代言」人。石濤藝事有所突破後，臻於「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的境界，山川脫胎於石濤，石濤脫胎於山川，山川與石濤（境／物與我）兩忘而山川有石濤，石濤有山川。這之前卻有一個進程，是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sup>94</sup>。這當然是強調畫家的反覆磨鍊，期使藝事更上一層樓，但這一個個奇峰無寧就是上述的一個個「場所」，「本身歷史」的根源。當石濤與山川神遇的時候，主體與客體的界限消融了，記憶透過當下的筆觸參與、演現在，山川「終歸於大滌」，這就是上述境地「終於完全屬於我們」的意思。就藝術言，「跡化」是呈現的山川沒有斧鑿痕；就上述的理論來看，這是主體忘記己身的意識、存在，而客體渾化，不強露形相的境界，的確是可遇而不可求。

我們接著讀幾段前人論詠物詩的文字。王士禛說：

詠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黏不脫、不即不離，乃為上乘。古今詠梅花者多矣，林和靖〔述〕「暗香、疏影」之句，獨有千古，……。<sup>95</sup>

又說：

<sup>93</sup> [清]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山川章》，收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冊，頁15。

<sup>94</sup> 石濤有名作《搜盡奇峰打草稿圖》，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館。

<sup>95</sup> 王士禛著，張宗衲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卷12〈賦物類〉，頁305。王論林逋詩聯出〈山園小梅二首〉其一，全文為：「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見〔宋〕林逋：《和靖詩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集部》本），第465冊，卷2，頁9a。

趙子固梅詩云：「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忽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雖不及和靖，亦甚得梅花之神韻。<sup>96</sup>

可見王士禛以不黏不脫、不即不離為詠物上乘，始得物之「神韻」。朱庭珍（1841-1903）《筱園詩話》說：

詠物詩最難見長，處處描寫物色，便是晚唐小家門徑，縱刻劃極工，形容極肖，終非上乘，以其不能超脫也。處處用意，又入論宗，仍是南宋人習氣，非微妙境界。則宛轉相關，寄託無迹，不黏滯於景物，不著力於論斷，遺形取神，超相入理，固別有道在矣。少陵〈畫鷹〉、〈宛馬〉之篇，〈孤雁〉、〈螢火〉之什，〈蓄劍〉、〈搗衣〉之作，皆小題詠物詩也。而不廢議論，不廢體貼，形容仍超超玄著，刻劃亦落落大方，神理俱足，情韻遙深，視晚唐、南宋詩人體物，迨如草根蟲吟耳。是以知具大手筆，並小詩亦妙絕時人，學者可知所取法矣。<sup>97</sup>

朱氏議論雖不見得怎麼高明（其譏諷晚唐並南宋詩的泛泛之論，甚至是有點討厭的），但頗可代表傳統詩論對詠物詩「微妙境界」的理想要求。要之，詠物詩描寫物色要超脫，宛轉相關，寄託無跡，不黏滯於景物，不著力於論斷，遺形取神，超相入理，始能神理俱足，情韻遙深。用石濤上面的話來說，是要追求脫胎，神遇而跡化的境界。對於詞作，評論家亦有類似的要求。《金粟詞話》說：「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為上乘。即間一使事，亦必脫化無跡，乃妙。」<sup>98</sup>《雨華盦詞話》說：「詠物之題，不能不用故實。然須運化無跡，而以虛字呼喚之，方為妙手。」<sup>99</sup>談的雖然是詞作中典故的使用，同樣要求「脫化」、「運化」、「無跡」、「天然」。

詠物詩的起點是體物，描寫物色，刻劃形容。這首先是主體（我）帶著主觀的情志對客體（物）的觀看、體認（這情志也可能是客體所誘發的），進而將主體當下的情緒轉移（transfer）於客體的形相、處境，隨物賦形，「神用象通」（《文心雕龍·神思》），「以形寫神」（顧愷之論畫語）<sup>100</sup>，力求主體與客

<sup>96</sup> 王士禛著，張宗祿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頁306。

<sup>97</sup> [清] 朱庭珍：《筱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404。

<sup>98</sup> [清] 彭孫遹輯：《金粟詞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

<sup>99</sup> [清] 錢裴仲：《雨華盦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4冊，頁3013。

<sup>100</sup> 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5，頁189。

體相契合。詩作成功與否，視乎經過藝術處理的客體能否體現主體及己身的情韻（神）。自始自終，體是大關節。

我們在上面轉述 Casey 有關境地與記憶的理論，並以之印證中國傳統對物、我、神的思考，是為揭示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的藝術結構作鋪墊。

明室與梅的歷史關係建立在兩個支點，都是關乎境地的：（一）靈谷的梅是因為靈谷寺受命遷址，且地靠孝陵而成爲王室的隱喻；（二）吉祥寺的古梅、紫峰閣的梅、福興山的古梅都在明室舊都南京一帶，順理成章被納入明朝地緣政治的（geopolitical）象徵的輿地。作為前明舊都，南京「獨特的潛能」和它的「紀念性」無庸細表，而孝陵中的明太祖就是它的「守護神」。南京如同一個舞臺，在發揮它「活躍的影響力」，讓種種歷史記憶裏的經驗隨機生發，「展演」。它的「表情」和「情緒」在大均筆下，藉著自然物象的轉化，由明初的朝氣蓬勃變爲明亡後的生意蕭索。上文第二節所論的〈靈谷探梅〉三首的景觀，爲歷史記憶定位，帶來焦點。「往日園林畔，千株間白雲」、「見說鍾山麓，當年萬樹斜」都是明室盛時境地的表情，也是歷史的表情。明亡後境地的情態一變而爲「數枝當輦路，不忍吐瑤華」、「幾樹傍朝陽，猶承日月光」，是境地思想著過去而把記憶帶進現在。惟境地的情緒只可以是過去和現在的，將來還沒有發生，不能是歷史記憶的內容。可是，在南京境地中有一物事，承載著過去，體現著現在，也有可能（至少大均願意如此）延伸到未來—那是梅，大均所體之物。

梅是南京／明朝的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梅沒有隨著明朝的滅亡而消失，它們既是前朝遺物，亦是當下大均所目擊的景觀。加之它們由明入清，儼然是歷史的見證者。大均選擇梅作為吟詠的對象，毫不費力就找到一個連結過去和現在—甚至未來，從大均極力描寫梅的生生不息來看，未來這個元素在他的思想裏極其重要—的客體。當大均帶著個人記憶（personal memory）走向梅，梅也帶著前明的「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走向大均，而大均要在梅裏看出—也許我們應該說—預言未來（歷史在此刻告退，詩人的幻想取而代之）。

梅既是歷史記憶的內容，也是歷史記憶的體現，而當大均將梅擬人、喻人時候，一個新的主體就呼之欲出了。我們檢視上文第三節討論的詩篇，可以頗具信心地說，這個新的主體正在流露著明遺民的情志，且大均並不與這明遺民主體保持任何批判的距離，這明遺民無疑就是大均。試觀：「受命生南國，孤根不可移」、「一樹凌空白，孤心與我期」，言外之意不是很明顯嗎？這是擬人法，仍

需環繞著梅和明遺民的體去攫捕其神。詠物體詩又容許作者以己喻物，主體與客體交融，當大均以己比擬於梅之際，理論上可以說，就不再是描繪歷史，而是直接參與、演出歷史了。請看：「枝枝經百折，終不畏冰霜」、「月中長自傲，不愧此寒饑。冰雪歸玄鬢，乾坤寄縞衣」，是寫古梅？寫大均？是描述自然景象？還是暗寓身世、家國之思？這個象喻結構成立的時候，由梅所承載的歷史情態與大均已身的情志相激蕩，意義與意識的密度與可能性驟增。惟這個結構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是主體不游離於客體的體，且主體和客體都不強露己身的形相，大均脫胎於梅，梅脫胎於大均。（詩人的考驗就在這裏了。）李重華（1682-1754）《貞一齋詩說》有一個淺近的說法：「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裏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sup>101</sup>李重華所論雖是詠物詩「有我」及「無我」的兩個主要表現系統，但實際上，中國抒情傳統中，在同一詠物詩裏亦常兼有「有我」及「無我」的部分。是以我們不妨說，上文第四節諸詩就是交錯地運用這兩種結構謀篇，詩篇的觀點（point of view）、語調（tone）、意象（image）隨著「有我」或「無我」調整。

我們在上文一直用「詠物體」來標誌大均一六五九年的梅花詩。但上面的論述應已透露出，大均的詠梅詩是兼有懷古或弔古的意味的，這尤以「靈谷」一組為最。上述諸組詩標明「靈谷」、「吉祥寺」、「紫峰閣」、「福興山」等地名，理論上，時地之感既彰，境地的歷史記憶亦自然納入詩作的象喻系統裏。但除了靈谷寺一組外，我們沒有凸顯這面相，因為除了靈谷三首以外，我們無法從實際地名出發，建立關於該境地重要的、特殊的（可轉化為文本細節的）歷史和文化記憶。如上所述，吉祥寺、紫峰閣、福興山的境地意涵來於它們所處的南京，以及明清二朝更迭的歷史情勢。職是之故，我們不宜過分強調它們懷古或弔古的面相。

大均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在一定程度上體兼詠物與懷古，這對大均寄託身世之感、家國之思是非常有利的。詩中主體、客體與境地相叩應而妙趣橫生。相對而言，我們觀察到，大均本年的懷古詩每每與所懷的客體保持一定的情感距離。蕭馳近著對懷古詩的美學特徵有相當精闢的見解，他認為：

在懷古詩中原型即非動作化的故事模式（mythos），而是一個程式化的

<sup>101</sup> [清] 李重華：《貞一齋詩話》，收入丁福保輯，郭紹虞校：《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年），頁856。

當下——在山水永恆中目睹一抹往昔輝煌的殘跡。當自然現象於天道中一再復現之際，雖然歷史在線性時間中無可重覆，個體間的生活斷片（而非在線性時間中的奮爭）卻重義地（tautologically）重疊起來。在此我們看到：史學的線性時間與自然哲學的循環時間之間交叉和妥協。正是由此交叉、妥協，生發出一種非連貫性的，分隔化（compartmentalized）的時間觀念。它成為中國抒情詩這一文類的獨特時間觀念：比起歷史敘述文，這一文類更多地涉及四季循環、若木、羲和這樣的宇宙論素材，然而卻並不呈現時間的持續。<sup>102</sup>

我們在上文讀過的〈靈谷寺〉正好體現著這些特點。懷古詩的收結多為一形式化（stylized）的、疏離的慨嘆，是哲學性（philosophical），存在性（existential），或歷史性（historical）的思維。〈靈谷寺〉前六句瀰漫著大均悼明的情思，但到了結句，一如我們熟知的許多懷古詩，轉向一更廣義的嗟嘆：「興亡無限恨，消得一聲鐘。」雖然這感喟不能說不深，但當明朝被納入在「興亡」一語所指涉的更大的歷史規律時，明室的獨特性也就消失了。「消得一聲鐘」，意象美矣，但在這漸漸消逝的鐘聲中，大均與明的距離亦愈拉愈遠了。大均同年另有〈秣陵〉一詩（秣陵為南京古名），亦用懷古體：

牛首開天闕，龍岡抱帝宮。六朝春草裏，萬井落花中。

訪舊烏衣少，聽歌玉樹空。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sup>103</sup>

假如我們不說這是大均一六五九年的詩作，我們會把這徘徊在古跡中，深情款款的烏衣少年看作大均，能理解「亡國」所亡的國為明朝嗎<sup>104</sup>？詩如此，詞亦如此，同年的〈念奴嬌秣陵吊古〉有「靈谷梅花，蔣山松樹」的意象，但大均幾乎是置身物外的：

蕭條如此，更何須、苦憶江南佳麗。花柳何曾迷六代，只為春光能醉。玉笛風朝，金笳霜夕，吹得天憔悴。秦淮波淺，忍含如許清淚。任爾燕子無情，飛歸舊國，又怎忘興替。虎踞龍蟠那得久，莫又蒼蒼王氣。靈谷梅花，蔣山松樹，未識何年歲。石人猶在，問君多少能記。<sup>105</sup>

<sup>102</sup> 蕭馳：〈中國抒情傳統中的原型當下：「今」與昔之同在〉，《中國抒情傳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年），頁120。

<sup>103</sup> 屈大均：〈秣陵〉，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09。

<sup>104</sup> 當然，這現象亦正好說明，詮釋中國傳統詩文，知人論世、知世論人不容偏廢。

<sup>105</sup> 屈大均：〈念奴嬌秣陵吊古〉，見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頁1251-1252。

上論種種，當可說明一六五九年大均流連在南京，愐想故明，感懷身世時，為何選擇詠物體詩來抒表他悼明之思和塑捏明遺民的形象和情思。惟大均所詠之物為何是梅而不是別的草木，比如說，松？要充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探論梅在中國抒情傳統中的象徵意義，以及其與遺民境況相比擬的可能性和適當性。這是我們下一節討論的重心，我們的視野將擴展到與明遺民有近似經驗的宋朝遺民。

## 五、古梅的象徵與遺民情境

我們讀一篇出自著名宋遺民鄭思肖（1241-1318）手筆，充滿表演性的奇文：〈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sup>106</sup>。文章開首強調這不是一個杜撰的夢（literary dream），是確有其夢的：「德祐六年己卯冬至前三十六日，其夕三更後，鄭子得一夢。」鄭思肖說夢中他飄到了一座大概是「西蜀之極西」的山中。那裏形勢奇怪，「非漁樵耕獵所趨塗徑，其懶怪龍虎所區窟宅」。第三天黃昏，鄭思肖走到了一「深闊徹碧之溪」，他「竟行水面，水離足三二寸」。遂抵一洞，石門自開。鄭思肖「入之數里，始露霄漢，寬敞如平地，見可仰不可陟壁立之峰，聳身即騰飛至其上。得一盤石，潤潔如玉色，平滿整截，方可七八百丈，四垂陡絕，下視無底。上有大古梅一，結根鱗石之上，始一兩花，須臾盛開，香透頂腦」。奇境奇花奇香作祟，鄭思肖說他「顛喜」之下，「興趣辟易，手摘梅花食，頃空其樹，匪若世間梅花，帶清苦氣味，甜美如嚼新軟白石髓」<sup>107</sup>。且口咄咄，文其事欲紙，紙至，筆興隨之，懸筆飛寫，字狀極怪，不類世俗書」。其文曰：

我鍾先天至清之氣毓其神，必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形。……草木英華，後

<sup>106</sup> [宋] 鄭思肖著，陳福康點校：〈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17-120。

<sup>107</sup> 早於夢記，鄭思肖先有〈己卯十一月朔又夢食梅花夢中作〉一詩：「雁字高高兔國斜，濕光飛露沁流霞。狂來清興不可遏，喫盡寒梅一樹花。」同前註，頁49。看來，鄭思肖之愛吃梅花已成癖。他有自傳性的〈一是居士傳〉，其中提到：「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為悅。」（頁138）楊萬里亦嗜吃梅花出名，其〈夜坐以白糖嚼梅花〉說：「剪雪作梅只堪嗅，點蜜如霜新可口。一花自可憐一杯，嚼盡寒花幾杯酒？先生清貧似飢蚊，饑涎流到瘦脰根。贛江壓糖白于玉，好伴梅花聊當肉。」見〔宋〕楊萬里：《江湖集》，收入《誠齋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本），卷7，頁9b。

天之清氣也，梅獨優之。一陽而花，六陽而實，爲純陽之果。其花天真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夭彼之命。黑魔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脈之仁，出而萌芽欲絕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夙骸腥淳，盪化真水，培固命蒂，歸脈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所食數溢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飛身陟之，千清萬奇，業併心目。空中有聲之者曰：此玉真峰頂也，邇來四百萬劫，無人至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全生，更莫算其幾微塵劫。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荒老，萬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王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根絞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構爲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立梅下，頻嗅頻笑，方瞳不瞬，溜碧相射，竟欲與之俱化，泯而爲一。倏躍而動，手盡其葩，齒鍊爲丹，火涼水浮，玉池甘香，骨瑩肉化，鼻舌毛孔，悉逆散香霧。六合同同，燦發玉光，萬返乎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身，還我於無極，於戲偉哉！

鄭思肖說，寫畢此文之後，他舉頭看梅樹，古梅「又英英而花矣」。花愈盛，香愈清，鄭思肖又欲採食。但當他仰面長笑的時候，「聲震空碧」，於是驚醒。醒後他覺得神思恬淨，舌根猶香。他說夢中之文，凡千餘字，一筆而就，但早上醒來已忘了一半，又有二三百字怪不可曉。他只好「剔抉其支離，脈絡之以意，潤色之以辭，仍紀顛末，遺爲他日一笑耳」。

我們沒有在上文「德祐六年己卯」之後加注西元，因爲這是歷史上子虛烏有的一年。德祐是南宋恭帝的年號，一二七五年建元。德祐嚴格來說只有一年，德祐建元次年（1276年），元軍破臨安，虜宋帝北去，二王倉皇浮海南逃。張世傑、陸秀夫等擁立端宗，建元景炎。但假如德祐果有六年（從他一二七四登基那年算起），則干支是己卯沒錯，西元是一二七九年。歷史上這已是宋帝昺祥興二年。本年二月發生了一件大事：元軍圍宋帝昺於厓山，陸秀夫負帝蹈海死，宋祚至此乃絕，元人入主中國。

鄭思肖是個傳奇人物，這個「記」的內容本身又帶有強烈的志怪、遊仙色彩，而當我們勘破「德祐六年己卯」的虛構性（fictiveness）和一二七九年不尋常的歷史意味時，我們就放心以政治寓言（political allegory）的角度來詮釋這篇文章的某些面相了。就記文來看，鄭思肖之得遇、得吃這古梅的過程曲折離

奇。在貌似真實的某年某月某日某個時辰，鄭思肖入夢，到了仙境（可能是西蜀極西僊怪龍虎所區窟宅之地）中的仙境（在可能是西蜀極西的仙境經過三晝夜，之後飄過水面，穿過洞穴，飛上高山始發現）才遇上這株古梅。但又真有那麼難嗎？鄭思肖在文章較後部分說：「夫人之夢，皆紛雜之念凝之於神，因其昏昧，乘氣機恣縱變化，其魂實未嘗出於身外，真有所遊歷。」然則，夢的內容來自繁縝心頭的「念」。夢的發生跟古梅再次開花的深層結構是一樣的。這古梅與天地日月同生，伏羲未生之前（人類文明出現之前）曾開花一次，現在夢中的鄭思肖碰上祂第二次開花，而這是「天地荒老，萬物多故」（人類文明瀕於滅亡）之際。古梅出於「欲仁下土」，拯救衆生之念，「故又開花」。文章的託寓結構是容許我們把這天地荒老、萬物多故的時刻連繫到一二七九年元滅宋這歷史境況的。

古梅無疑是鄭思肖的鏡子影像（mirror image）。有一個關頭，鄭思肖幾乎「梅化」：在真氣最清勁，鄭思肖神思最顛廮之際，鄭思肖「頑立梅下，頻嗅頻笑，方瞳不瞬，溜碧相射，竟欲與之俱化，泯而爲一」。接著他突然躍動，把所有的梅花吃盡，體內接而起了神奇的變化：「齒鍊爲丹，火涼水浮，玉池甘香，骨瑩肉化，鼻舌毛孔，悉迸散香霧。」這意味著在某一意義上，鄭思肖已與古梅俱化，泯而爲一了。他把古梅的精粹吞吃之後，全身的機能都透露著梅的氣和質。鄭思肖自稱本來就跟梅氣類相通，他說他「鍾先天至清之氣毓其神」，並「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形」。在他看來，梅秉後天至清之氣，故嗜吃梅花，平生所食超過千數。但這還是世間的梅。仙境中的古梅卻是與天地日月同生，「世不得聞，仙不得識」的。這古梅自然是清中至清，奇中至奇的梅樹了。古梅之再現、再華，是祂「欲仁下土」。吊詭的是，如祂隱身於這夢境中的仙境中的仙境，又如何能救蒼生於水火？這就是鄭思肖不得不把古梅吃下去的原因了。當鄭思肖把梅花全然「內化」（internalize）的時候，他就變身爲這至清至奇至真的救世者了。一二七六年——我們記得，這是宋恭帝爲元人擄去的那一年——鄭思肖作〈久久書〉，文首說：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閼國脈，貪官虐吏剝削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吾

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sup>108</sup>

情辭慷慨激烈。宋亡時鄭思肖僅一太學生，未授官，嚴格來說並非宋臣。他自稱「大宋孤臣」，作〈臣子盟檄〉，是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下而言的。他的天下、正統、中國等同趙宋，相對於他斥為夷狄、犬羊的元人。鄭思肖「德祐」年間的詩文呈現一個繁富的，互相指涉的政治託寓系統。在〈夢遊玉眞峰餐梅花記〉較後部分，鄭思肖特別指出，經典和歷史的一些著名的夢都是「託言」，「假夢以喻其意」。言下之意，是要我們推敲他「餐梅」這奇夢背後的寓意。我們認為，在鄭思肖「德祐」年間這個託寓系統裏，「德祐六年」仙境中古梅「欲仁」的「下土」可以理解為已為蒙古所滅的南宋，而這仙境裏的古梅寄託著鄭思肖作為宋遺民的情志和幻想。我們尤其要思考「花」（動詞）的寓意。古梅雖奇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但「結根鱗石之土」。這象徵祂存在的空間是借來的，現實裏無地容身<sup>109</sup>。（或曰祂仄隘的生存空間是竭力爭取得來的。）雖然如此，鄭思肖見祂時，「始一兩花，須臾盛開，香透頂腦」。鄭思肖顛喜之下，摘食梅花，「頃空其樹」。鄭思肖一邊吃一邊寫下上引的文章。這過程時間的長短無法量度，但「頃空其樹」予人極短暫的印象。書文訖，鄭思肖舉頭看古梅，祂又已「英英而花」了。花愈盛，香愈清，鄭思肖又欲採食。但此際他被自己的笑聲驚醒。儘管如此，我們已意會到，即使鄭思肖真的把梅花又吃盡，古梅頃間仍會「英英而花」的。這象徵復生，生生不息。鄭思肖的古梅與屈大均的古梅就是在這層寓意上遇合。如上所論，大均〈吉祥寺古梅〉七首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復生。大均筆下，古梅的根雖「孤」，雖處「空寂」之山林，但飽含「元氣」（其一）。東風披拂，古梅半死的根復生，以「瑤華」應霜雪，結的「碩果」孕育著「乾坤」（其二）。經百折，不畏冰霜。到地花發，橫空影長（其三）。花隨晴日綻放，香氣滌蕩人心。

<sup>108</sup> 鄭思肖著，陳福康點校：〈久久書〉，《鄭思肖集》，頁103-104。標點有改動。

<sup>109</sup> 大均〈三外野人贊〉說：「予嘗見元張叔夏《山中白雲詞》卷有〈三外野人序〉，蓋鄭所南氏也。予不幸生與所南之時不異，而嘗有《翁山易外》、《詩外》、《文外》三書行世，自稱『屈子三外』。不謂所南先得我心，豈所南所著《心史》之外，亦嘗有『三外』之書耶？吾知之矣。所南之身，以為在天地人之外，其時之天地人不可以身在其內也。嗟夫，世有人焉，生於天地人之內而乃以為在天地人之外，又非遊方之外者可同日語，則其人豈非天下之至窮而無所歸者哉？予所著三《外》之書，非此之謂，而其人則與所南同矣。」見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2，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209。標點有改動。大均以「三外」形容鄭思肖，頗可與我們這裏的詮釋相發明。

(其四)。樹呢？凌空而白。花則先於春天返回大地（其七）<sup>110</sup>。至於古梅之與大均相期許與融合已如上論，今不贅敘。要之，大均與鄭思肖都以古梅的生生不息暗喻其遺民意志，以光復舊國為己任。

大均平生極心儀鄭思肖，乃至於取鄭思肖之號「三外野人」為己號，命所居室曰二史草堂；二史者，杜甫詩史與鄭思肖心史是也。大均在〈二史草堂記〉中說：「予也少遭變亂，屏絕宦情，蓋隱於山中者十年，遊於天下者二十餘年，所見所聞，思以詩文一一載而傳之。詩法少陵，文法所南，以寓其褒貶予奪之意，而於所居草堂名曰『二史』。蓋謂少陵以詩為史，所南以心為史云。」<sup>111</sup>〈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收入《心史》。《心史》於崇禎十一年（1638）在蘇州承天寺井中發現，後二年刻行，一時士子爭誦<sup>112</sup>。至一六五九年，《心史》流傳已近二十年，大均自然極有可能讀過〈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但大均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和〈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文類不同，我們亦看不出大均本年詩作（指的特別是「文本性」，textuality）有鄭思肖的影子。正因如此，當我們發現，兩個相隔三百餘年的著名遺民，同樣透過對梅的書寫寄託他們的心跡時，我們不得不對梅另眼相看。

梅是詠物詩的重要主題。林淑貞在其近著《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裏分析、歸納《佩文齋詠物詩選》<sup>113</sup>所收的各體詠梅詩，點出梅的基本性格和象徵—梅為耐寒植物，歲暮開花，故其託物言志之取義有三：(一)以負霜之姿，喻孤高幽人；(二)歲寒暗香浮動，不屈霜雪，喻人志節不屈；(三)花姿幽獨，不媚東風，不與群芳競艷，喻志士幽人，不與世推移<sup>114</sup>。大均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固

<sup>110</sup> 一二八〇年歲暮，鄭思肖有〈梅花〉詩一首，亦頌美梅花能從「寒結癱陰」那裏「奪得春回」：「寒結癱陰慘物華，莫將憔悴聽胡笳。明年無限風花在，奪得春回是此花。」（此詩第三句「風花」成詞，惟頗覺拗澀，且收句有「此花」之語，疑為「風光」之誤。）鄭思肖著，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頁77。說梅花有回春之力，其來固然有自。陸游〈落梅〉二首其二云：「醉折殘梅一兩枝，不妨桃李自逢時。向來冰雪凝嚴地，力斡春回竟是誰？」〔宋〕陸游：《劍南詩稿》（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叢要》本），第389冊，卷26，頁18b，總頁456。

<sup>111</sup> 屈大均：〈二史草堂記〉，《翁山文外》，卷2，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320。

<sup>112</sup> 關於《心史》的發現、流傳及真偽問題，可參陳福康：《井中奇書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sup>113</sup> 張玉書、汪霤等奉康熙帝敕編，收詩一萬四千五百多首，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為中國最大型的詠物詩選。

<sup>114</sup> 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年），頁159。

然體現著這種種特徵。但如要凸顯大均詩作的遺民意態，我們則特別要措意於大均對南宋以降詠梅文學的繼承。下面我們就詠梅之作在文學史上的發展稍加鉤勒，並介紹宋遺民詠梅詩數例，加深我們對梅的認識，並用以比照大均的詠梅詩。

梅在先秦是拿來吃的，沒甚麼文學意味。《尚書·說命下》說：「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經·召南·摽有梅》取象於梅果實的多寡。《楚辭》遍寫芳草嘉樹，卻不及梅。梅花要到宋代始成為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和素材<sup>115</sup>。

魏晉至隋，詠梅文學漸次出現，樂府〈梅花落〉嗟惜春光不再，征人睹物思歸。南朝宋、齊以下文人擬作，間或託物言志，用表不遇之感。南朝後期（梁、陳）艷情、宮體詩流行，〈梅花落〉多述閨怨，意象則以庭梅、園梅、階梅等為主。〈梅花落〉體以外，南朝文士直接詠梅者亦多，其興味則在摹擬物色、巧構形似。取景或早芳、落花、雪中覓梅、折梅賞枝，不一而足；取義則多著重梅為衆芳之先、映雪衝寒等。發軔之初，詠梅賦梅之作格局不大。

詠梅之作入唐以後漸多，內容與興寄俱有重大發展。初盛唐時雖多仍六朝風格，但已有走出閨閣，即景寫情，直抒胸臆之作；睹物傷懷，身世之感、離合之感已呈新貌。詠梅至杜甫而格局為之一大變。程杰認為：「杜甫把此事〔何遜詠早梅〕引入詩境，則突出何遜對景感懷的一面。這一微妙的改造標誌著梅花從最初的閨怨意象已完全轉變為文人表現時序之心、鄉國之愁的感懷抒情意象。」<sup>116</sup>唐代詩人不滿足於只為梅花的冒寒遇雪、早芳早零傷感。梅花開始置身於寒風、霜雪、冷月、寒水、修竹，詩人們用各種手法捕捉梅花的寒素、冷艷美。梅花比作佳人，頌其高潔。梅花寂寞野處、傲雪早芳，美其高尚，不與世推移。以其貞潔孤高，遂得以比肩於松、竹。有唐一代，梅花的人格操守意蘊漸趨成熟。

詠梅文學雖在唐代有重要發展，但始終要到兩宋方大盛。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說：「（梅）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sup>117</sup>而

<sup>115</sup> 下述先秦至兩宋詠梅文學的發展多參考程杰：《宋代詠梅文學研究》（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本文參考部分程氏先以論文發表如下：〈梅花意象及其象徵意義的發生〉，《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頁112-118；〈「美人」與「高士」——兩個詠梅擬象的遞變〉，《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頁102-108；〈梅花象徵生成的三大原因〉，《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頁160-165。

<sup>116</sup> 程杰：《宋代詠梅文學研究》，頁10。

<sup>117</sup>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頁33。

梅的人格象徵完全定型，成為士大夫道德操守的寄寓，是在北宋末及南宋。宋代作手以花喻人，託物言情，梅先以美人，後以高士的形象出現。林逋最愛詠梅，「疏影」「暗香」一聯尤膾炙人口，但沒有明確使用擬人手法。至蘇軾名作〈紅梅〉三首出，則全以美人擬喻。同時大家如王安石、黃庭堅詠花都擅於擬人。程杰觀察到：

雖然詩人們未必都有，或者說未必每一首詠梅作品都有托梅自寓的意興目的，但由於林逋、蘇軾等人的影響，至北宋後期，人們對於梅花的審美評價是普遍地提高了，梅花品格寒素冷峭、清疏淡雅、高潔脫俗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落實在描寫手法上，我們發現，從蘇、黃時代起，開始普遍以月宮嫦娥、瑤池仙姝、姑射神女、深宮貴妃、林中美人、幽谷佳人等「美人」形象來擬喻梅花。<sup>118</sup>

把梅比擬為美人、佳人、神女等，自然是梅秀潔超逸、風神磊落的外觀所誘發的聯想。而月宮、瑤池、深宮、林中、幽谷等則是取義於梅芳潔幽峭、離群索居的特性。有學者認為，在宋代的知性反省和審美觀下，梅花唯有表現出其抽象特質、上升為士大夫道德人格的象徵始會走完其象喻歷程<sup>119</sup>。這是不無道理的。梅至南北宋之交開始變身為士人。到了南宋中期，梅多被比擬為雅士、高人、隱者、狂者、狷者、逸民。夷齊、巢父、許由、屈原等人物固然詠梅詩中屢見，甚至連王昭君、蔡琰亦為詩人比擬作梅花。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於是說：「詠梅當以神仙、隱逸、古賢士君子比之，不然則以自況。若專以指婦人，過矣。」<sup>120</sup>

南宋未到宋元之交，出於對逃避避禍的願望及對國族存亡的焦慮，神仙與隱逸之流固然是梅重要的擬喻對象，而古賢士君子之忠貞不二者亦越蒙詠梅詩人的青睞。黃永武在〈梅花精神的歷史淵源〉中指出：「(南宋陸游)又說『坐收國士無雙價』(射的山觀梅)，給梅正式提出『國士』的封號，使梅兼稟處士出世恬退與國士入世受難的雙重性格。……於是中國歷史上偉大人物的風概，幾乎全

<sup>118</sup> 程杰：《宋代詠梅文學研究》，頁305。

<sup>119</sup> 龔鵬程：〈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收入黃永武、張高評編：《宋詩論文選輯》(第一輯)(臺北：復文圖書出版社，1988年)，頁175；《宋代詠梅文學研究》，頁308。

<sup>120</sup> 方批陸游〈梅〉(若耶溪頭春意惺)語，見〔南宋〕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本)，第146冊，卷20，頁36a，總頁198。

濃凝匯萃於梅花上了。」<sup>121</sup>宋遺民常寫老梅或古梅。熊禾（1247-1312）<sup>122</sup>〈湧翠亭梅花〉以老梅比擬其友詹君履<sup>123</sup>，說：

此花不必相香色，凜凜大節何崢嶸。北海雪深臣皓首，霜寒中野兒悲吟。<sup>124</sup>  
荷蓀老人留植杖，滄浪孺子來濯纓。神人妃子固有態，此花不是兒女情。

托根山谷居歲晚，自分不及芳春辰。春前臘後挺高潔，留與桃李爭妍新。<sup>125</sup>  
「北海」「霜寒」二句用蘇武留胡不辱漢節及三良生殉秦穆的典故表相忠良苦節。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孺子歌滄浪（《孟子·離婁上》），孔子勉門人以毋自侮、知進。則「荷蓀」「滄浪」二句強調隱逸自愛的可貴。湧翠亭這株老梅遂集忠義與隱逸於一身，熊禾藉頌美老梅的「凜凜大節」來稱贊其友，言下亦復自勉。熊禾在另一首詠梅詩〈探梅〉中說「曾得二三子，共賦梅仁詩」<sup>126</sup>。此所謂「梅仁」，是生生不息的意思，宋遺民以梅含此「仁」力，能排玄陰殺氣，奪回春陽，再造乾坤。熊禾說：

仁者天地心，生生無窮期。維此生之性，物物皆有之。  
安得似此梅，獨秉純陽姿。一枝一太極，靜動常相隨。

又說：

舍南有古樹，久矣閱歲期。至剛肯受磷，至潔寧爲緇。  
廊廟未覺高，山林豈云卑。但得餘帶在，一任羌管吹。  
明年煙雨中，青子還纍纍。更看萌生，生性常不虧。  
新根連舊根，不斷生生機。生機日以長，清陰漸成蹊。  
從此種千樹，春暗花垂垂。東風一解凍，萬卉紛芳菲。

<sup>121</sup>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207-208。

<sup>122</sup> 理學家，建陽（今屬福建）人，南宋咸淳十年（1274）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宋亡，教授鄉里，曾主洪原、鰲峰等書院。參《全宋詩》小傳，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70冊，頁44088；又參黃宗羲：《宋元學案》，卷64，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冊，頁483-497。

<sup>123</sup> 字無咎，曾為學正，生平不詳。參熊禾：〈送詹君履學正序〉，見黃宗羲：《宋元學案》，卷64，頁484-485。

<sup>124</sup> 「霜寒」一句當出〔唐〕劉禹錫：〈三良冢賦有序〉。賦文有句曰：「霜凌雪結，飛沙亂蓬，中野躊躇，屬此古墟。」又曰：「哀生人之長慟，赴永夕之莫曉。歸去來兮不可留，且悲吟於黃鳥。」見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卷599，第10冊，頁6807。

<sup>125</sup> [宋]熊禾：〈湧翠亭梅花〉，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70冊，頁44110。

<sup>126</sup> 熊禾：〈探梅〉，同前註，頁44097-44098。

這古樹「至剛」、「至潔」，久閱滄桑，可與廊廟比高，而安處山林，且一息尚存（「餘帶」），不畏「羌管」。羌管猶羌笛，這裏當喻元人。從餘帶復生而青實纍纍，從老枝旁出的新芽（「萌」）可看出無窮的「生性」。這不斷的生生之機，在熊禾「詩人的靈視」（poetic vision）裏，一發不可收拾：從餘帶到萌，到果實纍纍，到新根連舊根，到清陰成蹊，到千樹花果垂垂，最後從古梅而及百般花木，東風拂拂，競放芳菲。這景象簡直是復生的嘉年華（carnival）。林景熙（1242-1310）〈賦梅一花得使字〉則詠一老梅的「仁氣」：

玄冥雨霜葉槁地，誰爲乾坤挽仁氣。苔枝老醜春力微，絞出蛟宮剪初試。  
芳信不消三兩點，已壓春風二十四<sup>127</sup>。百花頭上頭更高，空谷天寒弄幽致。  
太素忽開渾沌苞，陽奇首淺河圖祕。山林骨格知無雙，冰雪精神真寡二。  
道人紙帳臥江月<sup>128</sup>，卻愛獨清同此意。淺波光影自相耦，憶向孤山作春事。  
斜陽凍蝶愁未知，海上先鋒青鳥使。<sup>129</sup>

可以想像這是一株老魄的古梅。「百花」、「空谷」、「山林」、「冰雪」四句與上熊禾詩中古梅「廊廟」、「山林」二句同趣，寫梅之幽獨孤潔，不與世推移。復次，林景熙這首亦寫老梅從「玄冥雨霜葉槁地」那裏奪回春陽，扶正乾坤。此見諸古梅初放的兩三花。古以「太素」爲天地元始<sup>130</sup>，今從古梅孕含著渾沌的花苞顯現。此純陽之姿，林景熙喻之爲人類文明的誕生，無異伏羲時龍馬出黃河，背負八卦之秘。詩末以古梅的花比作西王母的青鳥使者，爲神明與人類溝通的媒介。熊禾那道德化（moralized）的古梅和林景熙這神話化（mystified）的古梅，無法不讓我們聯想到鄭思肖夢記中及大均詩中的古梅（以

<sup>127</sup> 「春風二十四」，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謂，應花期而來的風。這裏借指百花。

<sup>128</sup> 《遵生八箋》：「帳制慢天罩床，此通式也。……余所制帳有底，罩帳之下，如綴頂式，以粗布爲之，……。或用紙作梅花，似更清雅。」〔明〕高濂撰，王大淳校點：《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下》（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286-287。

<sup>129</sup> [宋]林景熙：〈賦梅一花得使字〉，見傅璇琮主編：《全宋詩》，第69冊，頁43481。宋遺民詞亦有近似的表現。陳紀〈念奴嬌梅花〉說：「斷橋流水，見橫斜清淺，一枝孤裏。清氣乾坤能有幾，都被梅花占了。玉質生香，冰肌不粟，韻在霜天曉。林間姑射，高情迥出塵表。」除是孤竹夷齊，商山四皓，與爾方同調。世上紛紛巡檐者，爾輩何堪一笑。風雨憂愁，年來何遜，孤負渠多少。參橫月落，有懷付與青鳥。」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392。除了把梅比作林間仙子、姑射仙子、夷齊、四皓外，更頌揚梅花鍾天地乾坤的清氣。

<sup>130</sup> [漢]班固等撰：《白虎通》：「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39冊，卷4上〈天地〉，頁234。

及大均《廣東新語》中的嶺梅）。

上論大均詩中「南國」、「向南枝」（〈吉祥寺古梅〉七首其一、其七）二語在明清易代之際有政治象徵的意味，暗指南明各朝。其實，「向南枝」、「向南梢」、「南枝」（及與其相對的「北枝」）等語在南宋詠花詩中（不一定是詠梅）已有用為政治、歷史符號之例。楊萬里〈豫章江皋二首〉其二說：「只今秋稼滿江郊，猶記春船掠屋茅。可是北風寒入骨，荻花爭作向南梢。」<sup>131</sup>〈九月十五夜月細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經古人拈出紀以二絕句〉其一說：「桂樹冰輪兩不齊，桂圓不似月圓時。吳剛玉斧何曾巧，斫盡南枝放北枝。」<sup>132</sup>二詩以「北風」、「北枝」喻已佔領北地，且虎視眈眈的金國，以「向南梢」、「南枝」喻岌岌可危的南宋，透露著楊萬里對國勢與前途的憂慮。〈盱眙軍無梅郡圃止有蠟梅兩株二首〉其二則說：「臘裏花開已是遲，西湖十月見瓊肌。嶺頭猶說南枝暖，卻向淮南覓北枝。」<sup>133</sup>最後一句說「覓北枝」，因為蠟梅的北枝指向淮河，即宋金邊界<sup>134</sup>；前一句說「南枝暖」，則暗示南宋仍偏安。楊萬里以南北設喻，寄託他對南宋局勢的焦慮。至於「南國」或「南」<sup>135</sup>，在鄭思肖德祐元年（1275）以後的詩文裏，是南宋二王流亡政府的譬況。一二八年鄭思肖作〈德祐六年歲旦歌〉，悲憤地說：「南望二王未駐蹕，北億三宮猶蒙塵。」詩後附自注，大書特書詩題的寄意：「今日『德祐六年歲旦歌』，乃『祥興二年歲旦歌』也。大歲則庚辰也。南國正統，在天一涯，亦未嘗間斷焉。我陷虜雖六年，其實則德祐之民，故曰『德祐六年歲旦歌』。」<sup>136</sup>以南、南國象徵正統，鄭思肖無疑給了三百餘年後的明遺民詩人一個漂亮而沉痛的示範。

大均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顯然繼承了南宋以降詠梅文學的象喻傳統。但這只就大體而言，我們不強調南宋及宋遺民作品對大均之作在文本上有直接的影響，

<sup>131</sup> 楊萬里：〈豫章江皋二首〉其二，《江湖集》，收入《誠齋集》，卷6，頁5b。

<sup>132</sup> 楊萬里：〈九月十五夜月細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經古人拈出紀以二絕句〉其一，《朝天集》，收入《誠齋集》，卷25，頁5b。

<sup>133</sup> 楊萬里：〈盱眙軍無梅郡圃止有蠟梅兩株二首〉其二，《朝天續集》，收入《誠齋集》，卷29，頁7b。

<sup>134</sup> 參看蕭翠霞：《南宋四大家詠花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63-268。

<sup>135</sup> 與此相近的「南朝」一語，在南宋時已成為宋室的代語。如鄭思肖〈文丞相敍〉中記文天祥見金丞相伯顏，伯顏命之跪，文天祥說：「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見鄭思肖著，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頁122。

<sup>136</sup> 見鄭思肖：〈德祐六年歲旦歌〉，同前註，頁57-58。標點有改動。

雖然大均詩中個別意象與宋遺民作品或有暗合之處。實際上，大均詩的句法、章法，以至於美學企圖與宋遺民之作差別甚大。我們觀察到，南宋到宋元之交的詠梅文學情辭是相當激越的，相對而言，大均的語調就顯得沈著內斂多了。此外，宋遺民好用典故，以歷史上高潔忠貞的人物比擬梅。如上述熊禾的〈湧翠亭梅花〉，借詠古梅以詠友，在點出題旨「凜凜大節」之後，分別用蘇武、三良、荷蓀丈人、滄浪孺子四個典故來豐富忠貞與隱逸的意蘊。用典可增加意識的密度，深化概念。惟用典如過於繁富，飾羽尚畫，難免產生「隔」的反效果，有損詩的臨即感（immediacy）。典故的使用在詠物體中尤需審慎。嘗試言之。宋遺民大多託物言志。這點我們同意吧？我們亦會同意，詠物貴物我兩忘，力求跡化。這是說：「物=（我／志）」。括號表示跡化的企圖，我／志不強露形相，藉物言志。如詩中用典，則演成：「物+典故=（我／志）」。中間的典故越多，從物到我／志的距離可能就越遠。這是典故「明用」所引起的情況。是故，欲避免以辭害意，詩人可能應考慮「暗用」典故。上述大均詩明顯用典的地方不多；他的典實，多是「暗用」。例如「受命生南國，孤根不可移」（〈吉祥寺古梅〉其一）暗用《楚辭·橘頌》，而巧妙地把原文及寄意鎔裁在詠吉祥寺吉梅的語境裏。如明用，如姑射仙子之典（〈吉祥寺古梅〉其七），則賦牽涉的人或事予鮮明的性格，使其不流於蒼白空泛。「不食同姑射」中「不食」一語使梅及姑射頓添生命力，非徒為貞幽這一概念的標籤。這樣造就的隱喻式典故（metaphorical allusion）效果庶幾近於脫化、天然的理想了。大均詩不依靠「古典」，更重要的原因是詩篇背後已有一強大的、扣人心弦的「今典」（topical allusion）供他役使。這是明清之際的政治、歷史、遺民情境。當「誰將遼海雪，來折漢陵花」這一聯把這情境確立以後，大均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在在呼息著這一龐大的指涉（reference），寄意深且遠。大均序其友劉漢臣的詠物詩集，說：

《詩》之風生於比興，其詩婉而多風，無物不入，油然而感人心，善於比興者也。詠物之詩，今之人大抵賦多而比興少，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求之於實而不求之於虛，求之於近而不求之於遠，求之於是而不求之於非，故其言愈工而愈拙。劉子漢臣所為詠物詩甚眾，若雪與梅，尤其用意深遠者。言在此而所以言者在彼，其辭微，其氣象肅穆，使雪與梅之精神旁見側出於行墨之間，風人之能事至是而畢，所謂善於比興者非耶？<sup>137</sup>

<sup>137</sup> 屈大均：〈詠物詩引〉，《翁山文外》，卷13，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227-228。標點有改動。

大均自己一六五九年的詠梅詩無疑就是這種比興寄託理論的最佳演試。

我們不強調宋遺民詩作與大均之作的形似，或宋遺民對大均作品有直接的影響，但我們確信，宋遺民與大均的詠梅詩在精神上是極其相近的。宋遺民與大均都致力於書寫忠義、隱逸與復生這三個主題，以寄託他們不仕異族的意志及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熾熱幻想。從這角度來看，大均的詠梅詩在文學背後是有強烈的政治意圖的，正如他在論遺民之「道」時，暗寓他干涉政治、政權的願望：

南昌王猷定〔1598-1662〕有言，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大均曰：嗟夫，逸民者，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蓋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微耳，烏足以繫天下之重輕哉！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一二士大夫其不與之俱亡者，舍逸民不爲，其亦何所可爲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草茅，無關於天下之重輕，徒知其身之貧且賤，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於無窮者也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吾黨二三子者，身遭變亂，不幸而秉夷齊之節，亦既有年於茲矣。然吾憂其所學不固而失足於二氏，流爲方術之微，則道統失，治統因之而亦失。<sup>138</sup>

大均這番話語重心長，爲宋、明遺民——說逸民，實則遺民——道出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論謂遺民雖是政治與社會邊緣化了，貧且賤的布衣之士，實爲古帝王相傳的「道統」及「治統」承傳的「動因」（agency）。道統寄意於文化（大均將之等同儒家），治統則關乎政治與政權。遺民之「道」是道統及治統的延伸。大均勸勉秉夷齊之節的同道不要「失足」於二氏，歸依佛、道之門<sup>139</sup>。這是大均這段文字最尖銳（甚或尖刻）之處。（明、清易代之際，遺民之遁於佛、道者不可勝數。）在他看來，遺民是爲道統及治統而存在的，遺民亦定義著道治二統。二統合而爲古帝王相傳之天下，二者缺一，不成天下。遺民需集道統及治統

<sup>138</sup> 屈大均：〈書《逸民傳》後〉，《翁山文鈔》，卷8，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394。標點有改動。

<sup>139</sup> 康熙元年（1662）大均南歸後，蓄髮髻返於儒，並撰〈歸儒說〉以明其志。參汪宗衍：《汪譜》，頁1890-1893。大均在〈歸儒說〉中解釋：「予二十有二而學禪，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復從事於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無吾儒，而有吾儒則可以無二氏云爾。故嘗謂人曰，予昔之於二氏也，蓋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則吾之志必將不終於二氏者，吾則未嘗獲罪於

於一身，始得稱遺民。大均認為，「失足於二氏」即失道統；道統失，治統亦因之而失。大均之世，秉夷齊之節者義不食的不是周粟，而是清粟。則大均所欲傳、所欲恢復的天下，非明朝莫屬。大均論遺民之道嚴且苛，緣於他對治統存續念茲在茲，未嘗一日去懷。他稱美遺民之道，謂其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於無窮。宋遺民詠梅，大均詠梅，不亦隱隱然傳達著這理念嗎？

## 六、結語

詩人比興，觸物圖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文心雕龍·比興》）。在上文我們已看過大均如何諸方設喻，用表志之堅且固。惟詩者，志之所之也；詩篇透露的消息每每溢出詩人所欲設定的象限。當大均說：「寒光含雨雪，元氣在茅茨。空寂無人見，芳馨只自貽。」（《吉祥寺古梅》其一）或說：「一夜東風拂，春回半死根。瑤華答霜雪，碩果孕乾坤。」（《吉祥寺古梅》其二）語氣儼定自得，我們感受到的，是大均堅毅的意志和標峻的神識。但大均最後說：「巒巒山寺裏，鐵幹欲爲薪。……無花留太古，何草似靈均。再弄枝下，江南久望春。」（《吉祥寺古梅》其六）又說：「不食問姑射，無香到楚詞。憑君望寒歲，莫折向南枝。」（《吉祥寺古梅》其七）隱隱約約流露著焦慮與彷徨。這不只是我們上述大均對吉祥寺古梅的命運及其所象徵的遺民境況的憂慮，而像是一種更個人的，發自心底的憂悒。大均在意的是「靈均」和「楚詞」。屈原及《楚辭》無乃中國道德與文學偉大的「典律」（canon）。屈原雖流放，猶眷顧楚國，繫心懷王，雖九死猶未悔；《楚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漢世尊之爲經。大均自稱屈子苗裔，在精神及文學上祖述屈原，孜孜拳拳<sup>140</sup>。但大均能夠肯定，他的志業終會如屈原般流芳百世嗎？人們面對典律難免感到渺少，於是大均不自覺地說「何草似靈均」、「無香到楚詞」。況且大均出嶺已逾一載了，他的「深謀」似仍未能實行。「無花留太古」、「江南久望春」很可能

吾儒也。逃之而復能歸，得已而歸，則吾之志必將終於吾儒者，則吾亦未嘗獲罪於二氏也。」見屈大均：《翁山文外》卷5，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全集》，第3冊，頁123。大均在〈姓解〉一文亦說：「予弱冠以國變託跡爲僧，歷數年，乃棄縉服而歸。」同上書，卷10，頁174。

<sup>140</sup> 大均在〈自字冷君說〉中說：「予大均，一字冷君。冷君者，山名，在樂昌六瀧之上，山

出於他對時光無情流逝及抱負未伸的焦慮。

當時的政治形勢亦不能不讓大均憂心忡忡。順治十三年（1656），大均出嶺前一年），南明永曆帝流亡至雲南。鄭成功遣兵北上，節節失利，撤守廈門。順治十四年（1657），永曆所依孫可望、李定國軍內亂，孫可望降清，盡洩雲貴機宜。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清兵大軍壓境，十月入雲南，十一月進攻，李定國軍全線崩潰，十二月永曆帝自滇都出奔。本年五月鄭成功率師十七萬，自廈門乘船數千艘，大舉北上，全浙震動。七月，鄭師於赴崇明途中遭颶風，覆舟五千餘艘，漂沒士卒八千人，鄭成功之妃嬪六人、子三人皆溺死。鄭成功退守舟山。順治十六年（1659），約在大均寫作本文所討論的詠梅花同時，永曆帝先自雲南永昌倉皇奔騰越，旋自騰越逃離中國境，入緬甸。朱明自此成為一個更遙遠、更疲憊的象徵。

由是觀之，則大均詠梅詩這一面相，又忠實地反映出遺民堅毅以外的另一重要心理狀態——在漫長的孤寂裏，在復明的希望日益渺茫時，他們難免感到困惑、彷徨與沮喪。

---

高大不減翁山，其名又可愛，而其音與靈均相似。予爲三閭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爲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光日月之志也。又以冷君爲字，使靈均之音長在於耳，人一稱之，不惟使予不忘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忘靈均，斯予之所以爲慈孫之心也。」同前註，卷5，頁127-128。

## 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 ——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

嚴志雄

順治十六年（1659），屈大均（1630-1696）寫下不少意義極不尋常的詠梅詩。（不下二十首，含詞一闋。）屈氏詠梅，每寓故國之思與身世之感。梅在屈氏筆底是明室的縮影、明遺民的化身。本文探究屈氏詠梅詩的結構、象徵、託寓，討論其引發的有關詩體的理論問題，並藉以闡示明清易代之際的遺民情境。本文認為，屈氏寫作這些詠梅詩是透過詩篇思考遺民在明、清改朝換代的歷史境況裏所可、所應扮演的角色。屈氏在在透露著一個信念：遺民雖為政治、社會邊緣化了的「微物」，仍應自許為改變歷史塗轍的媒介。屈詩展現三個互為表裏的母題：忠義、隱逸與復生。屈氏所關注的，是明、清之際的歷史記憶及明遺民主體性詩性的呈現，而這兩者是通過體物、詠物（梅）的手段而成就的。因而本文探析詠物詩體在屈氏操作下的形態。為了凸顯明遺民所面對、所喚起的情境，本文嘗試重構宋遺民和明遺民精神、心理意蘊的某些重要元素。

# Objectivity, Memory, and Loyalist Condition – Qu Dajun’s 1659 Poems on Plum Trees

Lawrence C. H. YIM

Qu Dajun (1630-1696)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1659 in Nanjing where he produced some twenty poems on plum trees. The plum emerges as Ming loyalism incarnate, and Qu encourages the reader to see him as a Ming loyalis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Qu shapes the Ming memory and his intended image in the poems.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and symbolism of the verses, we discover three interrelated motifs: loyalty, seclusion, and rebirth. Qu’s message is that even though the loyalists are marginalized figures of the day, they still see themselves as historical agents to revive the fallen Ming house. What engages Qu is a poe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the Ming loyalist subjectivity. Qu’s poems are written in the mode of “poetry on objects.” This entail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into Qu’s poetic formulations. To probe the loyalist condition that Qu is faced with, a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Ming and the Song loyalists is conducted.

**Keywords:** Qu Dajun    Ming-Qing transition    Poems on plum trees  
historical memory    Ming loyalist subjectivity  
loyalist condition